

贺龙事件始末

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贺龙冤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个年头了。然而，内中的一些事件仍旧因为历史的纷繁以致于没有办法理清头绪，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少数人在网上叫嚣着给林彪翻案因此使得这段历史变得比较扑朔迷离起来，我在整理一部分党史资料和走访一些当事人之后，觉得有必要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东西写出来告诉大家，借以对澄清这段史实做点微不足道的补充工作。

1.贺龙和毛泽东的渊源

长征是一次中**内政治路线的分水岭，也是一次绝大的政治考验。也就是在这次运动中，毛泽东第一次认识了贺龙。

在同张国焘南下分裂做斗争的过程中，任弼时、贺龙都作出了难得的贡献，之于当时的中央与毛泽东来说可谓是厥功甚伟。

贺龙自己曾经在一九六一年回忆说：“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身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其实，我那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么!”

朱德也曾经回忆道：“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并不多。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以上两段回忆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另外，根据权延赤在一九九六年五月采访薛明老人的笔录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贺龙对于毛泽东早在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了不同一般的忠心耿耿，薛明说：“贺龙同志就把枪掏出来，

摆在桌子上问大家：‘谁要是反对毛大帅谁就给我蹲下。’当然，没有人蹲下。这个话以后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中，可能是弼时同志或者向应同志说的。”（引自权延赤《1996年5月28日采访薛明、贺鹏飞笔录》第15页）张国焘之所以后来就范，除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以及南下策略的失败以外，就是二方面军任弼时、关向应、贺龙等人的联合抵制，特别是任、关、贺同他的斗争，较之前几种外力来的更为直接，从而使张国焘不得不收敛起自立中央的想法。

毛泽东适时在党内的威望远没有后来那样如日中天，贺龙的这些表态无异于雪中送炭，毛泽东内心的感触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亲自对林伯渠、陈正人嘱咐过：“你们要关心一下贺龙同志的生活。”以后，陈正人做媒，把薛明介绍给了贺龙，组建了贺龙一生最后也是最完美的家庭。而贺龙对于毛泽东的生活也是最为关注的，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贺龙赶赴一九四七年的河西会议之前还让警卫员把仅剩下的一斤水果糖带上，警卫员不解，因为这斤水果糖贺龙自己一直没有舍得吃，贺龙就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些虽说是生活上的小事，却如实的反映了毛泽东和贺龙当时的同志、战友之间的深厚感情。

除了以上的这些事情之外，贺龙对于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一向是严格服从，而且有的时候几乎到了盲从的地步。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我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是寸步不让的。”也正是因为贺龙在政治上的紧跟才进一步的取得了毛泽东的逐渐信任。

延安整风期间，王实味、丁玲等人先后写出了讥讽党内作风的文章，首先发现这种倾向的就是贺龙和王震，贺龙在干部群众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丁玲的错误观点，还骂了娘。为了配合延安的审干，贺龙在一二零师内部做了具体部署以致于扩大化，这点贺龙以后也发现了，并做了纠偏工作。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解决编制问题找到贺龙，请他挂帅，这种事一般说来都是得罪人的差使，但是，贺龙说：“主席点将了，我就是再苦再难也要上。”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接下了这副重担。

贺龙在和彭德怀合作期间，虽然有过一些并不愉快的记忆，然而，整体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特别是在宝鸡战役、西府战役中，贺龙给予彭德怀有力的支持，对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巨大的支援，1954年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引自1993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明清同志采访彭钢同志笔录）建国以后，一向很少当面称赞他人的彭德怀公开赞扬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彭贺的关系尽管不错，可是，一旦到了大是大非面前，也就是在选择是否紧跟毛泽东的选择面前，贺龙毫不犹豫的选定了毛泽东及其路线。众所周知的庐山会议期间，贺龙和李井泉、陶铸等人一道严厉的批判了彭德怀。李锐对此已经做过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多谈了。会后改组的中共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名单中，贺龙成为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号人物，毛泽东说：“军委日常工作，林在家林主持，林不在，贺主持。”所以，当时习惯叫贺龙为军委第二副主席。

在几十年的战争和建设生涯中，毛泽东对贺龙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贺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二方面军一面旗帜。”借用任弼时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贺龙的结论就是：“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引自任弼时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西北局工作会议报告《关于几个问题的报告》）

2.贺龙、林彪的交恶

贺龙和林彪本来没有太深的历史渊源，矛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历史就是喜欢捉弄人，从延安时期，一个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一个当年起义部队中的连长、在井冈山上质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林彪竟然结下了不解的仇隙，而且，这一仇隙因为以后诸多原因、背景不仅没有淡化，反而进一步深入，直到文革中有了一个总爆发。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很多政治仇恨当然都是来自政治层面，然则政治人物首先是人，党内多年以来因为山头、归属、主张乃至生活细节上积累的个人之间的意气、争执到了这时都需要一个平台给予了断，也因此我们在看待文革斗争除了从大处着眼之外，也不能忽视处于其中各派人物的私人恩怨纠缠，林彪、贺龙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政治分歧是一方面，个人相互的矛盾也是不容否认的另一方面。

那么，林彪、贺龙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到底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这要从分析林彪的个人性格入手。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林彪其人比较阴险，他善于权谋，善于伪装自己，以他跟随毛泽东多年，他是深知毛泽东的，然而，在毛泽东离正确越走越远时，林彪没有像彭德怀等人犯上直言，相反却激烈的拥护毛泽东，这位“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号称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利用了毛泽东借重他发动文革的契机，为自己的权力上升铺平道路，为自己的集团的发迹打下基础。之所以说林彪利用毛泽东的威望，这点只要看看林彪随手在医书、辞典上写下的那些评论毛泽东的“黑话”就知道内里了。

作为一手提携林彪起家的老师毛泽东对林彪如何看呢？只要我们翻翻史料就会知道毛泽东对于林彪早就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而之所以毛泽东还要借重林彪不但是林彪的军事才能，也是政治形势使然，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考虑的是切身的政治利益，为了政治利益，政治家从来是不惮于和任何人结成同盟军的。当然这些不等于说毛泽东不欣赏林彪的军事指挥能力和林彪在政治运动中的悟性。在毛泽东需要林彪时，林彪的这些才能、优点

就站到了首要位置，而一旦当毛泽东决定抛弃林彪时，林彪的这些东西就显得碍手碍脚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以上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廖汉生晚年曾经就毛泽东、林彪、贺龙三人的关系做过一段回忆，林彪在抗战时期见到蒋介石以后曾经面谏蒋介石是抗战伟人，而且说了一些比较不符合林彪身份的话，蒋介石在洛阳召见前方将领时，林彪还就蒋介石的问题写了很多好话，给蒋介石评功摆好，这个条子他是写给贺龙的，以后贺龙带在身上被警卫员洗衣服时给洗烂了，这件事林彪引以为心病。（以上详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83页）

3.陶铸·贺龙·林彪

贺龙在听到毛泽东对林彪的评价以后曾经和陶铸谈及林彪的历史问题，为什么说是陶铸呢？在延安期间，陶铸给王稼祥做过秘书，这时候的秘书不像后来领导人的秘书，它所担负的职能是多项的，与其说是秘书，毋宁说是助手，就如同李井泉给贺龙做秘书一样。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陶铸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副主任，陶铸担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之后和王稼祥的关系不错，陶铸的妻子曾志对此做过回忆。（参见曾志1989年11月15日在《王稼祥选集》首发仪式上的发言）那么，贺龙和陶铸是怎么相交并且来往的呢？

1942年2月，延安整风正式开始，此后也就是在四月里面，中央组建军属直属系统委员会，负责军队的整风工作，当时一共指定了十一位同志作为组成人员，而王稼祥、陈云是

负责人。6月7日，中央总学委把整风小组分为十个小组，其中第四组的组长是王稼祥，副组长就是贺龙、陶铸，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错，陶铸这个时候比较受重视，他还是军委系统负责整理整风学习笔记的特别是抽阅工作的四位负责人之一（另外三人是陈云、王稼祥、陈子健，另陶铸、贺龙的任职事详《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302、303页）。

整风运动最大的涉及就是个人的历史问题，虽说没有完全触及，但也是十分严峻的，每个领导人都要过筛子，这时，贺龙向陶铸了解的林彪的一些事实际上陶铸本人也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在历史上陶铸和林彪并非一个系统，然而，陶铸此刻掌握着军委系统领导干部整风学习的大量的笔记，自然能够看到一些问题，王稼祥、陈云负总责，而陶铸则是具体主持工作，解放战争期间，陶铸在东野工作，和林彪的关系有了一个进一步发展的阶段，贺龙在建国以后还和陶铸谈起过林彪，当然也都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

问题关键是陶铸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贺龙和他谈及的林彪的事情向林彪、周恩来做了汇报，此时已经是文革了。当周恩来得知以后还不十分肯定此事的来龙去脉，然而，周恩来、李富春、江青三人代表中央和毛泽东向贺龙问讯时（江青不在场），贺龙承认了此事是真实的，不过贺龙强调：“我只是问他知道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的问题，就是在延安。”（参见《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三卷498页）这件事也被看作是贺龙在背后向林彪“捣鬼”的“罪状”之一，而原本是毛泽东亲口向贺龙讲可以找其他同志谈谈，当然，贺龙已经不可能在这种时候拉出毛泽东作为旁证了。

4.叶群·薛明·林彪·贺龙

贺龙、林彪之间的个人恩怨纠缠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叶群与薛明的不和。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名叶瑾。来延安之前曾在国民党中统系统的电台里当过播音员，

也曾经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工作过，特别是同国民党的军官关系比较密切，并且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而且获奖。并向国民党中统办的壁报投稿。另外，叶群的家庭背景也比较复杂，叶群的舅舅和国民党当地政府关系很好，叶群能够当播音员就是由于她的舅舅的推荐，叶群的父亲叶君奇本身就是国民党军少将。

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叶群的这些表现算不得过火，也不能因此就说叶群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但是，延安整风期间，本着“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方针，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说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洗澡下楼”（陈毅语），每一个人都要写自传，包括党的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在内，然而，叶群没有如实写出来，薛明作为叶群曾经一起流亡的同志，从天津到北平这一段时间中，薛明对于叶群的语焉不详十分不满，出于对党组织的负责态度，对此薛明做了补充，比如薛明指出叶群的入党时间是假的，叶群填写她自己入党时间是一九三六年，然而事实上叶群三六年并没有入党，叶群也说不出当时的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来。叶群在江西期间，表达自己对蒋经国的崇拜之情，和当地县长李林的关系很近，薛明把这些事情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书面报告，在目前留下来的这份报告的抄件（原件已经在叶群逃跑之前被烧毁）中，我们仍旧能够看到薛明当时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薛明未免求全责备，可是，在那时候的那种背景下，薛明这么做是再正当不过的了。

贺龙对于薛明的这份材料当时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他批评薛明说：“你搞的什么名堂，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对于叶群同林彪之间的婚姻，贺龙作为旁观者是不同意的，他曾经就叶群把林彪给她的私人通信公布给大家看一事找薛明谈话，请薛明背后劝一劝叶群，贺龙说：“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参见薛明同志回忆笔录和《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十三章）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叶群其人，叶群此人一向好慕虚荣、生活作风十分不严肃，就是到了她的

晚年，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叶群的生活秘书王蓝多回忆叶群同黄永胜之间的肉麻关系以及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勾引、挑逗他的经历都足以说明了问题。（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焦焯《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和林彪》天地图书公司 1993 年版）而叶群在延安期间的名声就不是很好，贺龙虽说戎马倥偬也有所耳闻，所以，他并不赞同这件事。当然，他也只是从一名战友的角度出发。林彪对于中组部了解叶群的历史问题很不满，口出怨言，贺龙曾经劝过林彪，他说：“不能让国民党的坦克开到你的床铺上来。”（参见《中国高干夫人档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而薛明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也说：“贺总劝过林彪要注意叶群的作风，林彪不听。”林彪曾经就薛明写信一事问及贺龙，贺龙说：“你老婆有事我老婆揭发，我老婆要是有事，你老婆也可以揭发。”（参见《林彪与毛泽东》，冯治军，皇福国际有限公司出版，1996 年香港版）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上看，叶群对此恨之入骨，以后几次三番的指示折磨薛明都是来自叶群，如果说林彪因为这件事就和贺龙不共戴天的话，那是站不住脚的，不过，这起摩擦对于贺龙同林彪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新一层的阴影也是自不待言的。

以上贺龙和林彪之间的私人纠缠并不能成为林彪最后决定整倒贺龙的唯一理由，更为主要的是建国以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两个人在政治主张、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二人之间斗争的白热化，而个人恩怨则在政治斗争中被进一步的发酵，成为整个政治斗争中的一份催化剂。

5.贺龙、林彪的政治矛盾的升级

贺龙和林彪的政治斗争的升级是在一九五九年之后。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发动对彭德怀的斗争，林彪、贺龙出自不同的出发点都积极的参与了，事后，中共中央军委改组，林彪、贺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毛泽东提议，林彪身体不合适的时候，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主持。次年一月，贺龙又出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主抓全军军械生产，这个时期的贺龙走到了他人生的权力顶峰。

林彪在成为军委第一副主席以后，抓了几件大事，第一个就是突出政治，集中在军队中部署吹捧毛泽东的活动，第二个就是安插亲信，控制海军、空军；第三个就是清洗不服从自己领导的军队首长。这三点的共同目的就是在于巩固他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和在毛泽东身边的地位。毛泽东决定用林彪代替刘少奇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培养林彪在党内的威望是毛泽东首先要考虑的，为此毛泽东也是煞费苦心。高饶事件出来以后，因为林彪陷入很深，毛泽东在事发之前让陈云赶往杭州去给林彪通气，随后林彪就被毛泽东保护过关，七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提议邓小平、林彪同时进入政治局，邓是批判高饶事件的主力军，进入政治局不足为奇，而林彪一度上了高岗的“贼船”居然也进入政治局，于此可见毛泽东的用意。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高饶事件做自我批评，他说在认识高饶的问题上，他不如陈毅、阎红彦，他拉着阎红彦做道歉，然而，两个月以后，在高饶事件上有了重大污点的林彪居然再度被毛泽东提名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

尽管在毛泽东的一再奖掖之下、林彪扶摇直上，可是，林彪在党内的地位特别是取代刘少奇的地位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条件并不成熟，林彪在军队中的资历、成绩自不待言，然而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接班人，那就不仅要在军队中，还要在党务系统中、政府系统中都享有一定的威望，才能站稳脚跟。在这点上，林彪不如刘少奇，也不如邓小平，甚至不如周恩来。刘少奇的地位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历史形成的，历史上，刘少奇两次在毛泽东离开中央的时候成为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第一次就是毛泽东重庆谈判，第二次是延安撤退，组建后委，后委负责人实际就是代理中央主席），刘少奇衔命改组新四军，从而确立毛泽东建军思想在南方八省的领袖地位，建国以后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担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以下毫无争议

的第二号人物，包括毛泽东自己也对外国人说他之后首先就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履历也比林彪深厚，邓小平是陈独秀当年的著名的“八大秘书”之一，（其中还有毛泽东）中共中央秘书长，早期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的创始人，以后在抗战、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的地位都不输于林彪，特别是建国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书记处的领导人，成为毛泽东在党务系统的第一发言人，被毛泽东誉为“副帅”。邓小平在五六十年代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狠抓国民经济建设，在党内享有比较高的威望，七千人大会以后，邓小平更是中央一线的主要负责人。而林彪出于韬晦的心理，长期不问军政，以养病为主，所以，他的班底形成很晚，而且也就局限于军队内部，即便是军队内部的班底也是六十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

林彪的“窜升”在党内军内不服气者甚多，薛明晚年回忆陈毅有一次和贺龙谈话时就用了个十分轻蔑的口吻说：“没想到那个人会一下窜到那样的位置上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见到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杨勇、廖汉生时劈头就是一句：“你们看过林彪同志没有？你们要尊重林彪同志，要多请示、多汇报。”（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一版，258 页）这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闭幕，林彪的地位已经确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深化以后，陈毅当着叶飞、陈丕显等人的面还说：“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参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红卫兵首领蒯大富也曾经交待说：“他们分析，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参见董保存《杨成武在政治漩涡中》）

对于这些险象丛生的情形，林彪自然是洞若观火的，他曾经对吴法宪说过：“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吴法宪交待一九六七三月十五日，林彪找他谈话的经过）那么，什么是“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呢？林彪在六零年以后陆续整倒、打击的谭政、罗荣桓、罗瑞卿等人的背景中我们就会知道所谓的不好的人就是不听林彪招呼的人，不按照林彪

的指示办的人。而一九六六年以后这个靶子就锁定在贺龙的身上。

贺龙同林彪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件大事上，前面我们说过，林彪复出以后办了三件大事，其中有两件事后来被认为在贯彻中有“重大抵触”，突出政治工作中，林彪和谭政、罗荣桓先后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结果谭政罢官、罗荣桓靠边，然而，与林彪更大的对立的还是大比武，大比武这件事被林彪看的十分严重，林彪最终利用这件事搬倒了罗瑞卿，当然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同样要负有重要的责任，没有他的点头，罗瑞卿是不会被整倒的，在上海会议期间，罗瑞卿被停职的同时也宣布贺龙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除此以外，林彪安插亲信李作鹏、吴法宪控制海军、空军，而贺龙曾经代表中央军委表态支持萧劲光等人，被林彪视作压制、打击。

文革起来以后，林彪认为是和贺龙总摊牌的时候了，决定出手处理贺龙一事。

6.林彪摸准了毛泽东的主脉搏

林彪在军队中开展对毛泽东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并不是没有人不知道他的用心的，最早开始抵制林彪做法的就是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以后罗荣桓也出面干预，林彪报请毛泽东同意以后，对谭政、罗荣桓进行了反击，二人一“死”一“伤”。

（死指的是谭政被降职处理，以后又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通知因为林彪的阻挠，迟迟得不到发表）一九六零年召开的天津会议上邓小平公开质疑林彪的高举、紧跟，与会者彭真、刘少奇也批评了林彪的这种别有用心的做法，然而，深为受用的毛泽东却并不对林彪提出任何指责，相反给林彪打了不少的埋伏，虽然毛泽东口头上也含混的表示要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宣传问题，可是，实际上，对于林彪的那一套做法，毛泽东是比较欣赏的，所以，天津会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会后，林彪进一步的推动个人崇拜的风气在全党蔓延开来。这次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首先开

炮，接着邓小平出面，连平素谨慎发言的周恩来也赞成邓小平的意见，反对林彪等人简单化、庸俗化毛泽东思想，中央包括彭真这位准常委在内，多数常委的意见是反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的，这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不多见的，然而，阵容如此强大，毛泽东却避重就轻，仍旧不愿意指责林彪，林彪作为长期追随毛泽东的领导人自然不会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会逆常委们的意见而行，因为这个个人崇拜的举动正是搔到了毛泽东当时的痒处，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毛泽东需要这么一个人崇拜出台，在这个大原则之下的所作所为都将为毛泽东所容忍，而对抗这一大原则的行为不论多么冠冕堂皇都将遭遇失败。（邓小平有关这次会议讲话参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283页）

事实证明，林彪的揣摩抓住了毛泽东的当时的主要心理特征，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路下，不仅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而且，党内的民主生活也逐渐走向消失。林彪利用了毛泽东晚年的这个重大错误，在清洗反对者的活动中大打出手。八届中全会上撤销谭政的职务以后，以后又拿罗荣桓开刀，谭政从井冈山时期就被毛泽东带在身边，毛泽东在搞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期间就和谭政的岳父关系很好，谭政的岳父也就是陈赓的父亲，谭政革命以后把原来的名字谭世铭改为谭政，结果，毛泽东特意让宛希先调来谭政的入党志愿书看，才知道谭政原来就是陈绍存（陈赓之父）的女婿，选他为前委秘书。几十年下来，谭政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始终和罗荣桓、萧华一道，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尊佛”之一。（参见《陈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第5页）罗荣桓和毛泽东的渊源就更不用细说了，然而，一旦把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放在是否坚持简单机械的推动个人崇拜的天平上时，毛泽东几乎毫不犹豫的倒向林彪的一边，这种招法，林彪以后百试不爽，从打击谭政开始到整倒罗瑞卿，林彪终于摸准了毛泽东的主脉，这次就又把枪口对准了贺龙。

7.贺龙·林彪·李作鹏·萧劲光

林彪上台以后急于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军队各个领域，其中，他的海军、空军寄予厚望。一九六二年，他调任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李作鹏为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林彪交待李作鹏去了海军之后，要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海军那里现在思想混乱，反对四个第一，纯军事第一的观点，是没有彭德怀的俱乐部。”李作鹏进入海军以后很快就秉承林彪的意思，和海军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萧劲光严重对立起来。（参见中顾委委员周仁杰《忠贞不渝 顾全大局——怀念萧劲光司令员》）李作鹏到海军以后，张秀川也陆续到位，以后终于在文革初期形成海军的“李王张”的一统天下，（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1965年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和1966年海军党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上，李作鹏集中攻击萧劲光不听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招呼，另外搞一套，林彪在北京抛出东海舰队检查工作结论报告，报告中作出了“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四个第一没有真正放在第一，在海军党委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的偏向”的指示，李作鹏在海军内部公开说萧劲光是五八年反教条主义的“漏网之鱼”。林彪在一九六五年说：“我就是要在海军打开一个缺口。”张秀川有一次阴阳怪气的对萧劲光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用考虑一线二线了，直接到三线休息好了。”以后，李作鹏口头传达林彪的“林副主席指示要点”，剥夺了萧劲光在海军的领导权，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林彪、李作鹏关于撤销萧劲光的职务的请求，但是，萧劲光已经在海军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参见《萧劲光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然而，海军问题甫一出来，贺龙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贺龙针对李作鹏在海军内部拉帮结伙曾经这么谈及：“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来斗争。要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贺龙还说：“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有的人的屁股凭什么摸不得？党章有权利嘛。”然而后面这句话被别有用心的人传了出去，成为“林彪的屁股有什么摸不得”，林彪说：“贺龙在海军的讲

话只能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军委，也不能代表毛主席。”

萧劲光在向贺龙、叶剑英诉苦以后，贺龙鉴于当时的情形，也不得不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他说：“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起来。这个问题，正、副司令员，正、副政治委员都有责任。”但是，他同时也勉励萧劲光“事久自然明”，并且说毛主席还是相信他的。这些事情自然也瞒不过林彪、李作鹏等人的耳报，也因此成为萧劲光的又一条“罪证”，王宏坤后来说：“贺龙在海军给萧劲光打气，萧劲光有了后台就疯狂反攻倒算。”

不过，萧劲光确实在海军内部搞过一段的“软顶”林彪的事情，一九六九年六月，萧劲光因为“历史问题”被降为海军党委第二书记，造反派质问萧劲光是否反对过林副统帅时，萧劲光默不做声。而此前李作鹏等人组织围攻萧劲光时，萧劲光根本不买李作鹏的帐，厉声指责李作鹏，搞得李作鹏十分下不来台。（参见肖永定等《亲爱的爸爸，安息吧——纪念父亲肖劲光》）贺龙间接的为萧劲光讲话，也是因为了解到毛泽东对萧劲光的一个基本态度，虽说没有更多的给萧劲光帮忙，然而也因此得罪了林彪、李作鹏，文革起来以后，李作鹏专门递交给杨成武《关于贺龙压制海军党委整顿思想的报告》，（杨成武是当时的贺龙专案组组长）以后黄永胜接手贺龙专案组后，李作鹏等人的下手就更加直接了。

8.助纣为虐的吴法宪

继李作鹏之后，吴法宪也奉林彪之命跳了出来。

吴法宪，江西人，放牛娃出身，十五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师青年科科长、团政委、支队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兵团副政委等职务，建国以后历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

在林彪的所谓“五虎大将”中，吴法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物，很多党史刊物上连载的有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描述中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把吴法宪刻画成为一个典型的“草包司

令”，似乎唯唯诺诺、惟命是从就是吴法宪的本来面目。吴法宪被捕以后，凡是见到训问人员一律称之为首长，凡进门必称报告，其人交待问题的态度是空前之好，由此更加验证了此人草包的一面。然而，实际上呢？

对此，长年致力于研究林彪集团犯罪的军旅作家肖思科有过一段精彩的论断，他说：“吴法宪并不草包，相比之下，他满肚肥肠的弯儿比一般人要多。对于他来讲，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功名利禄，自己可以含垢忍辱，可以忍气吞声，可以毫不在乎，可以装聋卖傻。由是，许多人把目光留在了他嘻嘻哈哈、点头哈腰这一面。”（《特别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吴法宪是“装傻”。他的装傻也是由来已久的，或者说也是历史形成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段吴法宪的“光荣历史”。

一九三九年八月间，著名的湖西肃托开始了，在王须仁、王凤鸣的把持下，郭影秋、梁兴初等一批党内军内的骨干分子被屈打成招，几乎被枪决。以后，幸好罗荣桓赶到解决了问题。而肃托的始作俑者王凤鸣的第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支队政委就是吴法宪，肃托事件出来以后，罗荣桓曾经急电吴法宪，要他赶去先行处理，然而，吴法宪始终没有到位，后来事件平息时，罗荣桓问吴法宪：“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上述罗荣桓、吴法宪对话引自《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然而到了公元一九六五年，吴法宪就不再胆小了，也不再犹豫不决了，他先后在林彪、叶群的暗示、鼓动之下，用写信揭发、公开讲话等方式诬陷罗瑞卿、林月琴、叶选宁、叶向真、谭政、萧华、余立金、杨成武、许光达等多人，当然还有贺龙，而且，他对于贺龙还有格外的关照，这点我们后面将详细谈及。

一九六六年，吴法宪曾经在空军内部把对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成“反党集团”，以后有人把这件事汇报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七月，刘邓指示要对海军、空军的问题进行整顿。七月十一日，贺龙在军委常委会研究空军的问题时，明确指出：“空军内部派性比较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只会报喜不会报忧，有些事情就是一面之词，有些成绩经过了解以后发现是假的。”虽然，那时候贺龙已经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然而仍旧直言不讳的提出空军出现的问题。

可是，贺龙的这种正常的工作上的意见、看法，却被林彪、吴法宪视为插手空军，林彪在听取汇报以后，明确支持吴法宪、李作鹏，林彪说：“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八月下旬，他在和吴法宪等人谈话中第一次说到贺龙，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他还提醒吴法宪注意贺龙，“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吴法宪同时还找到叶群哭诉，叶群也给吴法宪打气，吴法宪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诬告贺龙，该信长达五页之多，对贺龙各个历史时期都做了歪曲，特别是无中生有的指责贺龙要谋反，是罗瑞卿的黑后台，和彭德怀是同一类坏分子。以后，当审理江青、林彪两案的办事人员向吴法宪出示这些东西时，吴法宪供认不讳。

在吴法宪、李作鹏动手的同时，林彪、叶群还为进一步整垮贺龙准备了更为猛烈的三部曲。

9.林彪要对贺龙“削其羽翼”

林彪打击贺龙可谓煞费苦心，就像他以往指挥作战一样认真，为了能够给贺龙最为致命的一击，林彪分为三步来走。

第一步叫：削其羽翼

1966年10月，林彪在同军队内部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座谈中首次提出，对于贺龙要“削其羽翼”。这等于说打响了对贺龙的第一枪。（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84页）那么都有谁才是贺龙的羽翼呢？在林彪看来无外乎这么几种人，第一种原来就是贺龙红二方面军的，比如廖汉生、王尚荣；第二种是原来没有渊源，但是，后来与贺龙一唱一和的，比如罗瑞卿、杨勇。

林彪对于罗瑞卿和贺龙经常在一起是早有察觉的，他曾经直接、间接的点过罗瑞卿，也让叶群出面提醒过罗瑞卿，叶群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我们这里是个病人，不能陪着总长钓鱼、爬山，请总长有时间来坐坐。”这里暗指罗瑞卿偶尔和贺龙周末钓鱼、爬山的事情。林彪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和罗瑞卿说：“现在贺龙出面做了很多的事，看来威望很高，我们的威信都不行，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嘛。”罗瑞卿听后很紧张对萧华说林总有什么意见呢？萧华自然明白林彪的“牢骚”，他点了罗瑞卿一句：“林总是觉得你和贺总工作上接触多了，反而不和其他的老总交换意见了。”

最让林彪感到不满的是罗瑞卿对于大比武以及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林彪认为大比武是侧面对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的冲击，还在毛泽东兴趣盎然的观看了北京军区的演习之后，林彪就让叶群以下去蹲点为名，搞大比武的黑材料。由于大比武中也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这样就给叶群一个可乘之机。叶群等人炮制了一个叫做《对三七九团一连3个“尖子”班情况调查》的报告，内中对大比武极尽侮蔑之能事，随后，叶群在另一份名为《军事训练》的报告中指责大比武是：“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一、二、三(单双杠)、扣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用这种鸡蛋挑骨头的办法向大比武泼污水。

林彪拿到叶群这些无中生有的报告以后，立刻告诉萧华让他带话给张宗逊，让张做自我

批评，而且，通过《解放军报》的社论来指责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当叶群的报告被提交给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时，立刻引来一阵阵不同意见和看法。杨勇、杨得志等人坚持正确的看法，而萧华等人则倾向林彪的意见，双方争执不下，罗瑞卿事后向林彪做了会议汇报。由于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人反对叶群的片面看法，林彪暂时没有作出什么结论，然而，以后，林彪曾经对人说：“罗瑞卿这个人不好，总参让他搞，他搞到贺龙那里去了。”在打击贺龙进入到高潮时，林彪终于把当年要说的话说了出来：“1964年贺龙搞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

林彪曾就对付罗瑞卿、贺龙做过一段“精彩”的总结，第一段是十六个字，叫：“大将点火、元帅升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第二段叫：“大将、元帅不能一勺烩。”这种言简意赅的语言是标准的“林氏用语”，除了林彪以外，再没有第二人能够用这么简练的文字来表达政治上的绝大阴谋。

一九六五年年底，林彪如愿以偿，终于征得毛泽东的批准，打倒了罗瑞卿，然而，这还不能算完，罗瑞卿倒台以后，林彪借口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未经他批准，“擅自”提交三十本马列著作要求军以上干部学习是“反对毛主席”，将肖向荣一举打倒，而在打倒肖向荣的会上，把罗瑞卿作为肖向荣的后台老板来批，这时，离瞄准贺龙已经不远了。

就在贺龙批评吴法宪之后的两个月不到的1966年9月，林彪再度发“威”，打倒了王尚荣，王尚荣是贺龙洪湖时期的老部下，当时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是在军内享有比较好的声誉的一名高级将领，他的能力被杨成武等人所看好，当传达毛泽东指示准备让杨成武担任代总长时，杨成武还向中央领导建议请王尚荣担任副总参谋长，作为他的副手。（《杨成武在政治漩涡中》，董保存）打倒王尚荣的目的已经十分明显，贺龙这时已经有所察觉林彪是对着他来的，然而，他没有任何办法。

在打倒王尚荣不久，林彪就开始摇动北京军区，首先针对的就是廖汉生、杨勇。林彪抓

住杨勇、廖汉生工作不团结互相闹矛盾这件事和廖汉生同杨尚昆的亲戚关系大做文章。

实际上，早在林彪臭名昭著的“五一八”讲话以后，廖汉生、杨勇就开始“失宠”了。首都警卫工作组成立之初，毛泽东、林彪的用意是调动部队防止不测，其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杨成武、谢富治，组员中连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郑维山、傅崇碧都有参加，唯独没有当时还是北京军区党委第三、第二书记的廖汉生、杨勇。（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由李雪峰兼任，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247页）

1967年1月8日，廖汉生被捕，十一天后，贺龙也被正式找去谈话，从此逐渐失去自由。

10.贺龙的“软肋”林彪喜欢打巧仗，也就是善于抓住对手的薄弱环节给予致命的一击，对于如何整垮贺龙，林彪也是如是办理的，前面我们讲过林彪首先提到要削其羽翼，那么之后呢？之后怎么进行下一步呢？

对于吴法宪等人的诬陷，毛泽东曾经说过要保贺龙，而林彪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这句最高指示的呢？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曾经对董保存同志回忆说：“叶群出来以后向我要文件，我多嘴说了一句，就说贺龙又出来了，叶群瞪了我一眼，然后就说首长说了有的能保住，有的就保不住，有的一开始要保，后来就保不住。叶群说这些话时是嘟囔着说的，很不高兴的样子。”（引自董保存走访于运深笔录，《共产党员》杂志内部版，中共辽宁省委主办）林彪的这番话等于摸透了毛泽东的心理，这也是十分了解毛泽东或者说几十年以来跟随毛泽东得出的经验之谈，非林彪不能道此。

文革开始以后，始终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下，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领导干部昨天还是领导，今天就变成阶下囚，所以，他们希望得到中央最高当局的庇护，而毛泽东尽管也提出要对一些干部烧而不焦，可是，终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些人毛泽东一开始明确要保，然而，发展到后来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不保了，这里面有一个复杂的转换过程，而这个转换

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政治较量的过程。也是各派势力消长的分水岭。

林彪的第二步就是寻找贺龙的“软肋”，确切的说就是贺龙在政治上的弱点。

在文革中如果要打倒一个人，一个中央量级的领导人莫过于做他的历史文章了，从刘少奇、陶铸、邓小平到后来的六十一人集团、陈伯达无不如此。周恩来临进手术室之前还对自己的上海往事耿耿于怀，毛泽东深夜让汪东兴请邓小平去他那里长谈，而后当毛泽东准备为邓复出做舆论准备时，首先提及邓小平当年没有被捕的经历，借此有别于刘少奇、薄一波、陶铸等人。作为一贯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当时的领袖的毛泽东的贺龙又有那些历史问题呢？或者说历史阴影呢？

贺龙在参加革命以前已经是中共的斗争对象之一——军阀。虽说这个军阀的称呼是后来林彪、江青等人加诸于贺龙身上的，但是，贺龙在南昌起义前的武装力量已经相当可观，贺龙所属的部队中很多高级军官称呼贺龙为“常哥”，烈士贺锦斋生前就有“跟随常哥闹革命”的诗句。（贺龙又作贺文常）廖汉生、王尚荣这些人或者是贺龙的老部下，或者是贺龙的亲属，贺龙的部队从革命前到革命后始终带有封建宗族的痕迹。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再加上贺龙起家的基础，他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根本不能回避的。贺龙一开始只能算是我党的同道者或者同路人，他自己在自传中也承认是在逐步的革命征途中才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终身的信仰的。林彪在批判贺龙的会议上声色俱厉的指责贺龙是一个“刀客”，这也是由贺龙的出身、历史由来，而后江青等人炮制的贺龙的所谓罪行实录，更是点出了贺龙“大军阀”的“本质”。

军阀是什么？军阀第一高度迷信武力，第二高度利己。一个带有军阀色彩的人即便是改造了世界观以后也不能完全洗心革面，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轨迹，这就是林彪、江青等人制造贺龙大军阀这个头衔的实际用意，换言之，等于告诉人们，这种带有先天性“军阀”特点的人是不可信任的。联想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的指责中也有军阀一类的名

词，可知这种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随便栽赃的。而我们再把目光投的远一点，联系到一九五八年的反教条主义中针对刘伯承、粟裕等人的质问，就会明白军阀之于毛泽东意味着什么？

贺龙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并不是从头就是毛泽东旗下的，他服膺毛泽东是在长征以后，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这是毛泽东多年以来对他的评价，既是贺龙的荣誉，也是贺龙的包袱。

武汉七二零事件爆发以后，林彪首先点出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其目的也是昭然若揭。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军队在创建、发展、壮大过程中隐藏了很多内在的摩擦、自残乃至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相反则因为建国以后更大的更为诡谲的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进一步发酵，成为一柄无比锋利的可以被随时引用刺向对手的政治利剑。在这柄利剑下，刘伯承、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等人先后都无情的倒下。贺龙自然也不例外。贺龙并不是毛泽东的“嫡系”，虽说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兼收并蓄、放手任用，不存在很多的什么地域、山头的偏见，然而，随着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政治阴暗面的逐渐上升，随着毛泽东极左政策的扩大推行，以历史渊源划线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毛泽东主导发动的文革的主要干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亲信部将、秘书、亲属之间，而文革的尾声到来之际，毛泽东更是出于惯例，把自己的侄子放在政治局之上，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毛泽东悲哀的一面，同时也提示出一种必然。

而林彪等人一再宣扬贺龙是二方面军的历史，也是从侧面点出贺龙并非最初毛泽东路线上的人，像贺龙这种人随时都有可能“背叛”毛泽东或者毛泽东思想。

为了给这一套诬陷的理论作出必要的实际证据配合，并且围绕着贺龙的历史问题做进一步的所谓的回应，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不正常的手段铺就了这么几条路出来。

第一个是熊贡卿一事，这是武汉市二十中学教师晏章炎提供的材料，晏的父亲曾经做过

蒋介石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他说贺龙曾经和蒋介石的招抚大员熊贡卿来往密切，而且，有乞降的事情。而事实上，贺龙亲自下令枪毙了诱降的熊贡卿，为此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曾经就此给中央写了报告说明，报告的原件就存于中央档案馆，在晏章炎这封信拿到手以后，江青、康生等人亲自向林彪汇报，在没有调查取证的情况下，此事就成为贺龙的“罪状”之一。（晏章炎以后因为诬陷贺龙一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第二件事是说贺龙策划“二月兵变”。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二月兵变”系康生、江青一伙侮蔑贺龙同志的调查报告》中叙述的二月兵变的来由是这样的：“1966年7月，北京大学一个工作人员就北京卫戍区曾在2月份来校联系进驻部分部队负责民兵训练一事，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质疑。大字报的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文中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康生知道后，先说是彭真搞‘二月兵变’，后又说贺龙搞‘二月兵变’。”

何以“二月兵变”这件事惊动了康生这样的老牌刽子手出面呢？这里面还有一番计较的。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罢免了曹轶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务，此前，曹轶欧就查抄康生的家庭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过一份材料，里面详细的谈到了二月兵变前后康生的所作所为，这份材料经过党史研究人员整理以后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党员通讯》上面，根据曹轶欧的说法，二月兵变之前，叶群找到康生，时间就是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后不久，叶群对康生说，现在都动起来了，贺龙为什么还没有动？康老是肃反专家，对待贺龙的历史问题，康老有没有什么高明的看法，贺龙到处插手军队，首长不满意。曹轶欧还说叶群走后，康生不愿意管这件事，曹轶欧本人也不赞同，她说贺龙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给人当枪使唤。康生批评曹轶欧头脑简单，康生说叶群突然来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林副主席对贺龙不满是由来已久的，我们现在不动以后就会被动。曹轶欧为了这件事还让值班秘书把叶群来访一事记录下来，以后这个东西保留在李鑫那里。

（李鑫也做了证明，证实材料确实经他保管）

曹轶欧还回忆一件事，那就是二月兵变的事情传开以后，邓小平做了一次辟谣，邓小平说：“这个二月兵变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这是邓小平在人民大学讲的，以后人大的造反派问我（指的曹轶欧）和康生，康生说有些事情你们以后就知道了。曹轶欧还抱怨康生为叶群他们背黑锅。（曹轶欧回忆全部引自《党员通讯》2000年第十一期《曹轶欧回忆文革中的康生》）

实际上，一些公开的反映文革历史的书籍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中国高干夫人档案》中就指出“康生为了配合林彪的‘政变经’，捏造了彭真、贺龙的二月兵变。”（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399页）

林彪的政变讲话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而六月下旬，康生就开始着手整理贺龙的材料，再结合康生以后主动要求给林彪出版《林彪文选》一事就可以看出来，康生所作所为是为了主动迎合林彪、叶群的整垮贺龙的计划的。

二月兵变这件事再次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贺龙“不可靠”，贺龙的“军阀本质不改”。第三件事就是叶群让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写出诬陷贺龙的六点证明材料。宋治国写的“揭发”材料中主要提到以下六点：

- 1.罗瑞卿家里办公桌下面压了一张照片，是罗瑞卿、贺龙、薛明、郝治平的合影，天天看，没有毛主席的照片。

- 2.我（宋治国）觉得贺同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

- 3.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 4.贺龙对警卫人员教育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把枪法练好，并且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百发百中。

- 5.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 6.据说贺龙曾经在他家电话上安装了一个窃听器。

宋治国的这份揭发材料是在叶群的不断督促下写成的，这份材料出笼以后，林彪马上作出批示，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诬陷贺龙的材料一起送到毛泽东处。

第四件事是李仲公对于贺龙的诋毁。

李仲公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他是贵州人，曾经奉蒋介石之命劝导贺龙“归顺”被贺龙一度扣押，解放以后，李仲公曾经以自己是贵州人地理人物熟悉为由请周恩来任命他做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薛明回忆，周恩来因此想到贺龙，请贺龙出面和李仲公谈一谈，李仲公见到贺龙以后很慌张，贺龙揭了李仲公的老底，李仲公灰头土脸，“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引自《不尽的思念》，薛明回忆周恩来与贺龙）以后，李仲公怀恨在心，当 1968 年 3 月 26 日，中央贺龙专案组到国务院参事室来了解贺龙的历史问题时，李仲公在专案组的逼迫之下把贺龙的两封信交给专案组，据李仲公称这是贺龙的亲笔信，内容是一九二九年贺龙向蒋介石表示要投诚。此信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郑凯以后又由总理办公室交给林彪处，林彪做了“此件很好，说明贺龙一贯立场如此”的批示，然后送毛泽东处，据说毛泽东看信以后大为动容。（《国务院参事室大事记》中记载：“1978 年 5 月 26 日，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说：“关于 1968 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 80 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1978 年 6 月 20 日，李仲公因患肺炎等症，医治无效，在北大医院去世。”）

以上四件事其中两件是反映的贺龙的历史问题，再联系晏章炎的那封诬告信，可以说是三件事，而二月兵变和宋治国的诬告则是贺龙历史“问题”的延续，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才让人们感觉贺龙有可能作出以后的这些事情来。

这里顺便说一下文革中的专案，现在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些似乎都是无稽之谈，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特别是专案经常披露出一些触目惊心的大问题、大事件，而平素大家已经习惯了接受某人或者某事的历史结论，一旦这些东西被翻转过来时，首先不是感到其他，而是震惊，即便是毛泽东也是一样。比如他对刘少奇（套在王光美专案组中办理）的专案的批示中就有“触目惊心”这句话，虽说刘少奇是毛泽东既定要打倒批臭的人物，可是，专案组提供的某些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仍旧让毛泽东大吃一惊，这也就是毛泽东在给章士钊回信中所说的“个别人情况复杂，尚难肯定”。

而贺龙这些材料特别是附送的李仲公提供的所谓贺龙的亲笔信以及晏章炎的回忆乃父晏勋甫的材料，让毛泽东对这位一直忠心耿耿跟随自己多年鞍前马后的贺龙同志有了新的看法，当然，毛泽东对贺龙早就有了他自己的判断，而且，这些材料送上去以后也就等毛泽东的一句话了。

10.谈一点关于毛泽东偏听偏信的话题

以前我们的历史书籍告诉我们，毛泽东既不准备打倒这个，也不准备消灭那个，最后出现那种结果都是因为林彪、江青等人背着毛泽东干的，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

而现在呢，网上一些人则告诉我们，毛泽东既准备干掉这个，也准备打倒那个，其他人都是服从、听命，林彪、康生、吴法宪他们都是冤枉的，因为他们是奉命行事，他们就和行尸走肉一样。

可是，这种说法却说不通，我以前讲过了，有人认为国内的历史资料是为执政当局服务的，那么也就是不具备完全的历史真实性，然而，身居海外的一些致力于指责周恩来的高文谦等人在给林彪反复推敲之后还不得不羞答答的承认贺龙一案是林彪亲自策划发动的，也就是说贺龙死于林彪之手。这就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以毛泽东、林彪为代

表的中央“左”派手上都沾有他人的鲜血，只不过份量不同罢了。

有些人试图用毛泽东这一面挡箭牌来给他们准备翻案的那些人说事，试图证明林彪、吴法宪之流的清白，我以为这是徒劳的，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白纸黑字的写过他们犯罪记录，这是不容篡改的。

当然，有一点应该明确，那就是没有毛泽东的批准，贺龙是打不倒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批准打倒贺龙与毛泽东一开始就决定打倒贺龙不是一回事，对于贺龙，毛泽东是有一种复杂的心态的，他也曾经明确指示要对贺龙一批二保。可是，毛泽东为什么最后听信一面之词决定打倒贺龙了呢？我在这篇长文的后面几章中将给予介绍。

此外，我提一点，现在流行的翻案观点是说到底就是毛泽东还是“英明神武”，因为只有英明神武的圣人才不会偏听偏信，才不会三人成虎，而事实恰恰相反，李银桥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清楚的记载了一件事，他和其他人约好，反复三次的向毛泽东撒同样的一个谎言，到第三个人说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相信无疑了，而翻过来要让毛泽东不相信这件事，也要通过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解释。毛泽东诚然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可是，政治家也是人，也有人的弱点。特别是晚年的毛泽东，多疑、善变，阴暗面上升，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权威被利用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我们以前一律强调毛泽东被利用而忽略毛泽东利用人而已。

文革离今天已经差不多四十年了，我们这些人虽然生在七十年代，但是，对于文革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这些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罪名，我们有过怀疑，这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六六年的红海洋一样感到费解，就像看到年轻人追星一样困惑，我再举一个例子，叶子龙和许建国、周荣鑫、赖祖烈四人在战争年代在五台山脚下的一次喝酒，叶子龙说为了雪地四兄弟干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在文革中成为叶子龙的一大罪状，雪地反党四人集团就此形成，其中赖祖烈被整死。可笑吗？可笑的同时也是可悲的。（参见《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134页)

11.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与权衡

林彪将贺龙的一切材料连同李作鹏、吴法宪的揭发信一并送到毛泽东处，此前，毛泽东已经通过有关人员了解到林彪针对贺龙所作的一些事情，只不过不置可否。林彪给贺龙的定性是“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手了”。而综合所有人的材料似乎都证实了一点，那就是贺龙不突出政治，在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经就突出政治一题做了重要表态，也就是说凡是坚持不突出政治的都将遭到罢黜。现在，可谓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等着毛泽东的表态了。

1966年9月5日，毛泽东接见贺龙，把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贺龙，贺龙说要和他们去解释一下，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继续重申对贺龙的一贯评价，一共是三点：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这三点最初还是毛泽东亲口对薛明讲的，地点是在延安。现在，毛泽东重复这段话等于告诉贺龙，他仍旧是这么看待贺龙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当你的保皇派”。（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四天以后，也就是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引自《贺龙传》）后来在给贺龙平反时，也就是八大军区对调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件事又做了一些回顾，他说：“我让贺龙先去看看林彪，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贺龙也是这样做的，九月十日，贺龙亲自拜望林彪。

贺龙是正常来征求林彪意见的，但是，叶群却如临大敌，张云生自己回忆，当时叶群十分紧张，让警卫人员躲在后面，时刻提防贺龙的“不轨”。算得上丑态百出了。（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林彪对贺龙提出一个看法：“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

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回答：“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两个人谈话时间不长，当然也谈不上愉快，毛泽东希望出现的“沟通”没有产生，裂痕仍旧。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披露出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找到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找林彪谈一谈，结果，邓小平自己说“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贺龙找林彪也只是谈了一次，实际和谈崩也差不多。而问题在于，邓小平、贺龙都是毛泽东主动提出让他们和林彪谈谈，其实也就是争取获得林彪的谅解。毛泽东发动文革，首先依靠的就是林彪，用江青的话说，林彪当时是“一尊神”，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天平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林彪的位置，换言之，也就是林彪可以做的了毛泽东一半以上的主。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曾几何时，毛泽东也是把这种罕见的信任赋予刘少奇的，黄花塘事件出来以后，陈毅对毛泽东进行诉求，然而，毛泽东却鼓励他“沉默”或者“学习”，不要急于对某些人作出评价。（事详《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39年6月1日到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白区工作的会议，在会上，刘少奇遭到了张闻天等人的批评，毛泽东第一次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刘少奇的一边，让大家第一次领教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欣赏。1963年，毛泽东自己亲笔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参见《共和国部长的挽歌》，高文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48页）由此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然而，一年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组织人准备打倒刘少奇了。对于毛泽东晚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很多高级领导干部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时还唏嘘不已。

而所有的反复其实都是来自对最高权力的掌握这一总根子上，不论是信任林彪还是放弃贺龙或者打倒刘邓，基本都是由此而来。毛泽东自己说过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是从不让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关乎政治命运的大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儿女情长、藕断丝连的，

相反则毫不犹豫、绝不迁就。

在林彪表示了他对贺龙的基本态度以后，毛泽东自己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对于贺龙的看法，毛泽东有一个分水岭，总体上说五九年之前的贺龙是让他十分满意的，贺龙虽说也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可是，他不同于张国焘，也不同于徐向前，他始终如一的紧跟毛泽东，特别是在大跃进、庐山会议期间，贺龙比之某些毛泽东的“嫡系”还要“嫡系”，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后来把军委的三分之一大权下放给贺龙的原因。可是，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看待问题的标准就是一个，那就是是不是突出政治，突出政治说穿了也就是是不是突出毛泽东及其领袖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林彪从不含糊，而且身体力行、主动推进，让毛泽东深为满意，但是，主持军委一线工作的贺龙、罗瑞卿则相对不那么得力，来自林彪的报告中还点出他们两个人的消极态度。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生活会以及其他会议期间，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毛贺对话引自《贺龙传》）一句“上不了纲”说出了贺龙的全部心曲和对文革的态度。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十分的重视，直到他临终之前还对文革的评价念念不忘，他自己虽说也批评过文革怀疑一切、大打内战是错误的，可是，他不允许其他人不承认文革的“巨大作用”，否定文革的“历史地位”，他把文革和他领导军民推翻国民党腐朽统治相提并论，称作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无论是周恩来采取软顶的办法，还是邓小平的主动修正都受到毛泽东的猛烈回击。他不能容忍他们在他活着的时候对文革说三道四，这也是江青集团以后屡屡得逞的主因所在。

而与毛泽东相对应的中央一些毛泽东多年以来的忠心耿耿的战友们对于文革又是什么态度呢？可以说贺龙的这个说法不是孤立的，不仅贺龙，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也是这种态度，特别是谭震林和李富春的态度。谭震林与李富春都是典型的左派，

李富春其人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一直不错，私人渊源很深，李富春在江西工作时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出面保他过关，谭震林也是有名的左派首领，历次过左运动中他都表现积极，然而，就是这样两个人在文革初起以后不是以往的支持、紧跟，至少不是无条件的拥护，相反他们一再表达自己的疑惑、不满，对于文革把国家把党把社会搞的一塌糊涂的现象他们无法和林彪所说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联系到一起，谭震林本人不仅在怀仁堂会议上大拍桌子，而且还在 67 年 2 月的十七日写下了著名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痛心疾首的说：“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感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下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引自《陈伯达传》，时代文艺出版社）这封被林彪批示为“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谭震林的亲笔信正是谭震林等人当时真实的心理写照，李富春曾经对身边人感叹的说：“我又读了一遍毛主席选集，我发现上面很好话说的非常好，可惜毛主席自己不照着上边所说的去做。”（引自《中**史人物传》，李富春词条）全国人***工委副主任乔晓阳在他 21 岁时作为留学生代表亲耳听到陈毅的愤怒的内部讲话，陈毅自称不希望再作“就这十一个人干净？”中的干净分子，他希望“把我拉出去示众好了”，（引自《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乔晓阳谈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这些激烈的反映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是完全知道的，所以，毛泽东放弃了对这些人的暂时保护，也让这些人领略了“顶牛”的危险，谭震林等“三老四帅”在二月逆流之后遭到无情的清洗，多次请假检讨仍不过关，以后虽说蒙恩上了天安门，却和权力中枢再也无缘，直到林彪死后，他们才被陆续解放出来，不过也是投

置于闲散之地。

从毛泽东对谭震林、李富春等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贺龙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了。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的列举了一些其他事例，旨在说明或者澄清一点那就是网上一直以来针对给林彪翻案的某些观点指出毛泽东打倒贺龙是蓄意为之，这是不了解毛泽东在文革前后的政治心路所致，贺龙也好、谭震林等人也罢，他们并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准备放弃的人，相反毛泽东一度还准备借重他们，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关心的询问贺龙为什么不发言了，毛泽东还希望贺龙能够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样冲到最前面，可是，贺龙没有做到，而贺龙和林彪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在选择贺龙还是选择林彪，毛泽东的天平的倾斜是毫无疑问的指向了后者。没有贺龙可以，没有林彪，文革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呢？这也就是毛泽东的大局观，在这个大局面前，贺龙当然是相形见绌的。

政治人物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他们最为看重的就是形势、利益和目的。在这三点的烘托之下，他们可以退避、妥协，也可以进攻、消灭；可以放弃道德、良知，也可以放弃亲人、战友。

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她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文革失败了，杀头、充军或者坐牢，我都一个人顶着好了，我是随时都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与其说江青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不如说毛泽东随时做好了牺牲江青的准备。江青在被捕以后一度咆哮公堂的喊道她不过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而已，既然自承为狗，那么主人就有豢养它的可能，也有抛弃它的自由。

通过阅读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准备发动文革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志在必得，不仅发动一次，而且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而后多次扫除”，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毛泽东是不惜排除万难、破釜沉舟的，所以，谁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谁就有被毛泽东抛弃的可能。然而，怎么抛弃或者说抛弃到什么程度，毛泽东还是有他自己的具体

的考虑的。

林彪在指责贺龙时曾经说过：“贺龙野心大，主席百年以后，他要造反。”这句话其实是似曾相识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和彭德怀说过：“老总，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好不好？我死了以后，你不要造反。”（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尽管说这番话时是半开玩笑的口吻，然而，他对彭德怀的猜忌已经溢于言表。而作为毛泽东以后的“最亲密战友”和一直的“优秀学生”的林彪照本宣科的重复毛泽东的话并且把这种担心用到贺龙的身上，应该不会很简单吧？也应该不会是心血来潮吧？林彪深知毛泽东自从建国以后的最大隐忧所在，所以，林彪的这番指责可谓对症下药。

一直以来，在研究毛泽东与贺龙关系走向破裂的过程中，不少人比较关注贺龙同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件事发生在苏联前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倒台以后，中国派出代表团试图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借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为名，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周恩来，副团长为贺龙，时间是1964年11月5日）在宴会进行期间，苏联国防部长、元帅兼推翻赫鲁晓夫政变的执行者之一的马利诺夫斯基与贺龙有了以下这样一番不同寻常也不愉快的谈话：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他还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对话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贺龙不仅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谈话及时的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也马上反击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中方以后正式向苏联方面提出严重抗议，苏共领导人对此一再道歉，并且声明要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等等。回到北京以后，周恩来、贺龙再次向毛泽东做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后表示赞赏周恩来、贺龙当时所坚持的原则立场。

毛泽东前半生两度失去指挥红军的权力，在党内曾一蹶不振，而这两次无一例外不是和共产国际的对反对毛泽东的人的扶持有关，毛泽东本人对苏联及其领导人的态度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他更是对那些企图挟苏联以自重的行为，哪怕是蛛丝马迹都深恶痛绝，而且，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历史上，高岗、彭德怀两个人的落马都和他们的与苏联人的关系不清不楚有关，毛泽东在 1956 年 11 月 15 日中央全会上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送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算一个。”（引自《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温卫东整理，2000 年 10 月第一版，202 页）而两年前，毛泽东在引用中国历史故事说起内部斗争一事时，他对苏联大使尤金是明显的暗示，暗示他对苏联人在背后的举动不令人满意。叶子龙还回忆到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个受排挤的人，反对我的人利害着呢，有些是非不明呢。”斯大林则打断毛泽东的话说：“胜利分清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叶子龙回忆录》，180 页）毛泽东的谈话里面显然带有一股子埋怨，而斯大林则是一种漫应和回避。根据叶子龙的回忆，毛泽东在苏联时还有几次提及王明和中**内的斗争，斯大林的轻描淡写显然不让毛泽东满意，所以，毛泽东在苏联的心情并不是很愉快的，由此还把矛盾转移到了陈伯达身上。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做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件事让毛泽东心里委实不舒服，他多次对此做了相反的评价，虽说比较克制，然而，他真实的对赫鲁晓夫的反感也是不言而喻的，他时刻提防中**内有人效法赫鲁晓夫做他的“秘密报告”，为此，他不厌其烦的多次警告党内同志。而对于里通外国这一类的行为就更让毛泽东洞若观火。陈毅作为毛泽东早年的战友说过毛泽东最大的优点是：“不二过”，也就是不再第二次的犯同样的错误。这个优点在毛泽东事业上升阶段理解为毛泽东虚心接纳不同意见，对自己增加帮助，而在毛泽东走向极左时则理解为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无上的权威和极左政策的贯彻，不惜动用组织手

段来解决不同意见和不同呼声，他不愿意大权旁落，更不愿意重演江西时代的个人悲剧。

秘密报告的情结在毛泽东内心深处稳稳扎根，庐山会议期间，萧华等人揭发彭德怀同赫鲁晓夫有过谈话，这种完全是诬陷的发言却得到了毛泽东最大的呼应，这不仅反映出毛泽东为了打倒彭德怀不惮于罗织罪名，也折射出毛泽东内心的真正担心所在。以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提倡平反，可是，唯独不敢触及彭德怀的公案，彭德怀的申诉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相反，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别有深意的告诉党内同志凡是有里通外国和秘密反党行动的人都要主动交待问题，争取主动，彭德怀的问题因此升级，中央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就是贺龙。

所以，基于以上的认识，不少人认为贺龙也是在这个问题上犯忌，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进而决定拿掉他。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是八届十中全会上抑或文革中反复强调的彭德怀等人的罪行都是里通外国，连组织军事俱乐部都是由此而来，可是，贺龙的问题实质呢？毛泽东没有如此说明。目前能够看到的毛泽东对贺龙的最早的定性说明是1968年1月，毛泽东在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上的亲笔批示，在批示中他称贺龙为“叛徒集团头子之一”。而在杨成武、黄永胜等人先后把持的专案审查组对贺龙的秘密审查中始终没有被交待调查里通外国的证据。

最让人不解的是，贺龙一案牵连十二个著名的军队专案审查，内中许光达、黄新廷、顿星云、雷英夫、王尚荣、谭友林等人备受折磨，许光达、谭友林、顿星云更是九死一生，廖汉生算是最轻，也是不准睡觉，可是作为“主犯”的贺龙呢？不仅没有组织任何一次有规模的批斗，甚至还拳脚都被忽略了，比起彭德怀、罗瑞卿甚至后来的杨成武，贺龙算是难得的“幸运”了，是不是贺龙比起这些人要官高爵显呢？显然不是，不是连刘少奇、邓小平都要被拉出来批斗吗？刘少奇在批斗过程中屡次被人推搡，连鞋子都被踩掉，一时狼狈不堪，彭德怀在批斗中直接被打断肋骨。黄永胜、吴法宪在彭德怀、萧华、许光达的专案上都曾经杀

气腾腾的作出过批示，唯独对贺龙的专案只作了“医疗要服从专案”的指示。叶群对薛明恨之入骨，然而，贺龙死后，叶群给专案组的批示只是说要把薛明弄得远一点，不要乱说乱动。难道是他们良心发现了不成吗？显然也不是。

邓小平曾经说过：“谁不听他的话，他都要整一整，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指毛泽东）还是有考虑的。”（参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贺龙、罗瑞卿、杨余傅这三个案件是林彪死后最早给平反的，其中贺龙这件事，毛泽东两次过问，而且，毛泽东还亲自指示不要核对，组织平反就可以了。而作为林彪费劲写出臭名昭著的“处女证明书”的“元凶”陆定一则没有那么好的命运，林彪死后，陆定一仍旧被关押。贺龙这边，不但子女家属找了回来，包括贺龙一案受牵连的人员也都陆续恢复工作，比如廖汉生，作为贺龙一度的亲戚（他娶了贺龙二姐的女儿，属于外甥女婿，以前说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不确），1967年1月被捕，1972年10月就回到北京，毛泽东亲笔在廖汉生问题处理报告上批示说：“廖汉生和杨勇一样都是无罪的。”（《廖汉生回忆录》续，317页），次年也就是1973年年底，廖汉生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毛泽东本人当着中央政治局或者中央委员的面前建国以后就做过两次所谓的自我批评，第一次是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二次就是在1973年军委会议上谈及关于贺龙、罗瑞卿这件事上，联系到以上的一些事实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我为什么举了陆定一的例子呢？表面上看陆定一最被林彪痛恨，可是，林彪死后，陆定一仍旧得不到平反，毛泽东对中宣部阎王殿的批示足以说明一切，陆定一不是林彪要打倒的，而是毛泽东亲自做了安排，也所以陆定一一家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此外，还有曾志的一个回忆，曾志说她在遭到某些造反派揪斗时，有人暗示不能对曾志动武，随后曾志就获得比其他“案犯”特殊的“礼遇”，而事后得知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打招呼，特别是毛泽东对曾志和陶铸从来没有相提并论。在文革中，夫妻家属互相株连是十分普通的事情，可是，曾志以中

国最大的保皇派的老婆却能幸免于难、劫后余生，难道也是偶然的吗？

现在，我们再来回想一下作为毛泽东的曾经的接班人邓小平同志的那番对毛泽东“整人”的论断就不难得出一个接近当时历史真相的结论来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没有必要针对贺龙进行什么像彭德怀那样的“大手术”，他对贺龙也是一直放手任用的，特别是五九年以后贺龙的紧跟，让毛泽东对贺龙十分满意。可是，毕竟贺龙只是贺龙，而不是林彪，他不能像林彪那样充当一个“历史证明是一个罕见的玩弄两面手段的人物”（该话出自吴江撰写《文化大革命的由来》，明窗出版社 1995 年三月版）当阎红彦、李井泉等人向他真实反映西南地区在文革初起后已经大乱时，他坐立不宁，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是，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群众发动的远远不够”（参见《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5 月第一版）他也更不会明白，在林彪等人的眼中他已经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贺龙对于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毛泽东是深有领会的，可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需要的贺龙的再度的紧跟换言之也就是忠心，贺龙没有，而且，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贺龙也不具备，相反，贺龙的对手林彪则在文革的最重要的几个回合的较量中成为毛泽东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在林彪、贺龙的取舍之中，毛泽东选择林彪是一定的，抛弃贺龙也是一定的，但是，毛泽东又不想像对待彭德怀、刘少奇那样对待贺龙，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贺龙自己能在乱云飞渡中去见周恩来，也能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进入暂时的安定地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默许，这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随着林彪等人对贺龙的进一步深入审查，毛泽东决定抛弃贺龙，不保贺龙了，把贺龙交出去，据曹轶欧后来交待，贺龙居住的地方，是不允许造反派去揪斗的，而且也规定专案审查人员不得对贺龙进行“武斗”等激烈方式。也就是说毛泽东交出贺龙仍旧做了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保留，虽说这种保留对于贺龙来说已经无补于事。

另外一点，毛泽东对于贺龙问题中的某些证据也处于一种偏听偏信的状态中，比如他在

平平时还计较贺龙身上经常带枪一事，而根据贺龙的保健医生曾昭耆回忆，贺龙是从不带枪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不得了，贺龙的秘书、保姆都做了揭发。”而曹轶欧交待贺龙的问题，康生曾经做过指示要“背靠背”，实际上是打破常规完成的内容。

即使最为优秀的政治家在极度集权的情况下也难免不出现昏庸一时为人所用的情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在利用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利用。而在这种相互利用、利益交换的政治游戏中，毛泽东尽管心知肚明，可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追求，他也只能听之任之进而批准默许。毛泽东晚年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政治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平衡的艺术。”在这种思想的驱赶下，贺龙完成了他自己的悲剧结局，而毛泽东自己也为自己的悲剧画上了至为浓重的一笔。

邓小平同志后来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及历史问题若干决议时涉及贺龙一事时曾经这么说过：“比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一开始是要整的，毛主席确实想过要保，虽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可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越整越利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等人背着他干的，造成既成事实，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大悲剧。”（引自《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525页）邓小平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从文革之后反观当初毛泽东所作的决定的一个总结。

毛泽东对贺龙的关照

这件事其实是放在我的这个长篇系列中《毛泽东批准打倒贺龙》这一篇里面的，现在提前把一些提纲一类的东西说说。

薛明在回忆贺龙事件时曾经写道：“1967年2月18日，总理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2月22日，总理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这里所说的中央应该不是只有周恩来，而能做出这种决定让周恩来遵照执行的只能是毛泽东。

这个时间是在周恩来、李富春约见贺龙谈话之后，这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决定打倒贺龙，所以，造反派不能直接揪斗贺龙。

杨成武回忆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之前还指示说贺龙要保，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不过，七二零事件以后，文革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决定抛弃那些对文革抵触的人，这里面包括贺龙，七二零事件以后的两个月，贺龙专案组成立。

在毛泽东1966年9月到1967年9月，在这一年中，毛泽东经过重重考虑最后决定放弃贺龙，而在这一年中，贺龙除了受到干扰以外，没有受到任何来自任何方面的揪斗，这是在文革初期十分不可思议的。

贺龙在人生的最后时期中，薛明仍旧陪伴在他的身边，比较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人这种待遇不说明一点问题吗？傅崇碧晚年回忆说他安排黄克诚的妻子和黄克诚住了一晚上，结果就被告到了上面，因此受到责备。黄克诚的量级比较贺龙如何？连黄克诚看守的都如此之严，贺龙岂不是应该更加严格？

就是在贺龙专案组成立以后，毛泽东仍旧没有公开点贺龙的名字，直到1968年1月才做了批示，而到了十二中全会后才公开表态不保贺龙了，这离最后一次接见贺龙已经两年的时间了，如果毛泽东真的一开始就主张或者主动打倒何必拖了两年之久呢？贺龙难道比刘少奇还难整？王光美专案最集中的时间也不过一年，而十二中全会上已经等于是补充打倒刘少奇的组织程序了，其时，刘少奇早已生不如死了。

最后，毛泽东在林彪死后除了解放十三位老干部以外，就是亲自主持平反了罗瑞卿、贺龙和杨余傅事件，贺龙的追悼会周恩来亲自参加，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批准，周恩来敢去吗？

会有那么高的规格吗？允许周恩来忏悔和内疚吗？再反问一句，如果毛泽东一力主张打倒贺龙，那又何必脱裤子放屁给贺龙平反呢？彭真、陶铸、杨尚昆、陆定一等人、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为什么都没有平反呢？

怎么就单单罗瑞卿、贺龙和杨余傅呢？如果把罪行都推在林彪身上，那么何以就贺龙、罗瑞卿、杨成武这少数五个人享受这种待遇呢？刘少奇、陶铸等人被打倒以后，牵连的人很多，他们这些人终文革结束之前都没有平反，更不要安排工作了，而贺龙的“死党”兼前任亲戚廖汉生，以及被指责为黑爪牙之一的杨勇在 1973 年以后相继安排工作，级别待遇不变。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综合以上的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一开始没有准备打倒贺龙，只不过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和毛泽东本人的权衡利弊得失以后才决定抛弃贺龙的，这点可以看看邓小平在文革中的一度沉浮就可以明白了，毛泽东也并不准备打倒邓小平，所以，毛最后才亲自打招呼给邓出来工作铺平道路。

如果贺龙没有死于最混乱的那两年中，想必他和罗瑞卿等人一样都会在文革的后期复出工作的。

毛泽东交出贺龙以后，贺龙受到精神折磨，以致于惨死，但是不能用这个结果来倒推历史的开端。

建国后毛泽东的两次自我批评

吴江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一文中回忆到毛泽东从来就不愿意在政治决策之后出现误差的时候做什么自我批评，他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利于领袖的威望，而李锐回忆毛泽东则说，毛泽东自己就讲过，他是从来不下罪己诏的。

大跃进以后，国家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七千人大会上群情激奋，各自都抒发出对大跃

进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说了两句自我批评的话，然而，那几句直接的错误归我，间接的错误也归我，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可谓是轻描淡写、敷衍塞责，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做这样轻飘飘的自我批评也是不愿意的，所以，作为一向善于揣摩毛泽东的林彪马上就抓住了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出人意表的大谈特谈毛泽东思想，还说什么凡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的时候或者在执行毛主席思想出现偏差的事后工作就出现了问题云云，这种公开唱反调的做法深获毛心，让毛泽东大为激赏，带头为之鼓掌喝彩，此后还问罗瑞卿讲得出讲不出这样的话来，而几年以后，毛泽东让罗瑞卿去看望林彪时还重提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可见林的这番讲话对于毛泽东是恰到好处的。

八届十中全会上，当有人再提三面红旗错误时，毛泽东勃然大怒的说，人哪有不犯错误的？不犯错误，天诛地灭。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中提到毛泽东在1962年的中央会议上公开说你们压了我三个月，我也要讲一讲的话。这说明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上的所谓的自我批评是大为恼火的，也是不甘心的。

文革之前的毛泽东的权威远没有文革中那么绝对，他说话时还有人插话，还有打断，他的思想讲话也远没有一句顶的上一万句，经过文革以后，毛泽东的权威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早请示晚汇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以下对于毛泽东犹如封建时代侍奉皇帝一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林彪法定接班人的身份和林彪费劲心力在军队中扶持起来的势力一旦开罪于毛泽东时不过几个月的功夫就化为齑粉。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更不会去做什么自我批评了。就算是他想做，那些溜须拍马之徒也不允许他做。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罕见的做了他建国以后第二次自我批评，我这里提的自我批评是指在高规格中央会议上，这次毛泽东是在军委会议上提到了贺龙等人的事情，他亲口说贺龙可能是搞错了，要平反呢，缺了贺龙不好呢等等。而且，还承认自己在杨余傅、罗瑞卿的问题上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要做自我批评等等。

如果我们深入一下背景就不难看出来，林彪死后，毛泽东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不仅国际上舆论不好听，国内也难以交代，这么一个写在党章上的第二号人物兼亲密战友作出连张国焘、王明都望尘莫及的丑事来，毛泽东即便威望再高也无法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希望通过平反一些人的过去来换取一些老部下对他的感恩戴德和重新归属。可是究竟平反那些人呢？是给刘少奇、陶铸、彭真、陆定一等人平反吗？是给六十一人集团平反吗？显然不是。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解放十三位干部，他们是：

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

这里面属于贺龙“死党”，被贺龙专案组专案审查的就有两位（李井泉、秦基伟）。而这些干部中曾经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就是谭震林和李井泉，他们两个人在文革起来以后先后被打倒，可是，他们在历史上是坚定追随毛泽东的，在毛泽东建国以后的历次左倾错误中他们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毛泽东尽管曾经对他们动怒，并且批准对他们烧一烧，可是，最后还是原谅了他们，把他们解放出来，换言之也就是像谭震林、李井泉这样背景的人，这样坚定毛派分子才有资格获得复出。李井泉在历史上和贺龙的关系十分之深，李明清就常年在贺龙家中（李明清是李井泉的儿子）。文革第一回合整贺龙就是从李明清身上做文章的。

所以，毛泽东建议给贺龙、罗瑞卿、杨余傅的平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因为这五个人都不是毛泽东最初力主打倒的，而是以后权衡综合政治情形才决定抛弃的，毛泽东才可能给他们平反，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帐算到始作俑者林彪身上，毛泽东只承担偏听偏信的错误，另一方面无形中等于给毛泽东再增添一个自我批评有错就改的光辉形象。这样做非但无损于毛泽东的威望，反而有利于逐步走出林彪之死给毛泽东威望带来的巨大冲击。算得上一举两得。

这些人的平反和以后邓小平的第一次复出如出一辙，然而，毛泽东本人对于文革仍旧不能否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刘少奇、陶铸、彭真等人继续冤沉海底的原因所在了。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运动打倒的，给他们平反就等于否定文革，这点上毛泽东丝毫不会含糊的。

因此，我们说毛泽东之打倒贺龙尽管要负一定责任，甚至说十分严重的责任，但是，毛泽东却并不是力主打倒贺龙的始作俑者。

现在一些人采取倒因果的做法把本来属于林彪的罪行一律推到毛泽东身上，这是不对的，他们两个人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尽管都是第一第二的，可还是有所区别的。而且，这种做法和若干年之前把本来属于毛泽东的错误推到林彪、江青等人身上一样不可取，属于走极端。

12.周恩来在贺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周恩来在贺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说是周恩来一生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所扮演的最为苦涩、无奈和内疚的。而在贺龙事件中周恩来所承受的压力和他所需要得到的必要的提示比较历次运动都让周恩来感到无比的深刻。

周恩来虽说不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可是，通过他在贺龙入党仪式的主持以及他对贺龙的欣赏，可以说两个人尽管相识较晚，仍旧比较融洽，尽管两个人的出身经历不同，仍旧能够相知相通。邓颖超晚年回忆周恩来在众多国务院副总理中与贺龙、陈毅的感情比较深一些。

（邓颖超秘书赵炜回忆邓颖超口述）这点从薛明、陈昊苏等人的回忆中也能得到验证，例如周恩来亲自出面希望张茜放松对陈毅的“管制”，以及周恩来与贺龙夫妇多次轻松的开玩笑般的交谈，可知他们的关系除了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战友的历史关系以外，还有一种普通人概念中的好友的关系。薛明本人就说过贺龙始终是拿周恩来作为兄长看待的。然而，这种人性化的关系在文革风暴来临时却显得实在弱不禁风了，实在不堪一击了。

毛泽东在没有明确表态打倒贺龙之前，周恩来对于贺龙是保护的比较好的，1966年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这时对于贺龙还不是十分危险，因为两天以后，也就是12月28日，贺龙参加了生平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到了毛泽东在贺龙的生平中的最后一次的召唤，让贺龙做到前面来听取会议的报告，可见，贺龙此刻还没有完全“失宠”。

目前，有些人在研究周恩来时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是并非周恩来主动要贺龙去他的住处躲避的，而是贺龙本人主动跑到那里去的，关于这一点，《贺龙传》编写组的工作人员在采访薛明时，薛明说到：“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经过核对以后，确认薛明的回忆符合史实，所以，在编著《贺龙传》时采取了薛明的这一段回忆。这段回忆说明了周恩来当时对于贺龙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还是保护为主。而试图用这个事情来说明周恩来没有主动迎接贺龙来西花厅避难就是什么软弱、虚伪也是不顾历史客观事实的。

薛明在《不尽的思念》一文中还回忆到：“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华厅见到周总理，讲明情况后，总理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象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总理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

这里我们需要记住一下1967年1月9日这一天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前一天也就是1月8日，贺龙的“死党”之一的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被捕。1月9日这一天，林彪公开

发出指示说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林彪还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引自《贺龙传》）就在这一天里，周恩来还作出了让贺龙留住西花厅的决定，这说明了什么呢？

薛明同时还回忆说：“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华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这也就是发生在林彪讲话之后的两天以内的事情，又说明了什么呢？

周恩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着贺龙，虽说这种保护在周恩来来看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也坚持不了多久，不过，仍旧能够折射出周恩来当时真实的心境。对于贺龙的问题，杨德中后来回忆时说“总理是能拖则拖。”周恩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只能做到这点了。

贺龙在周恩来处住了十天左右，周恩来、李富春、江青代表中央和贺龙谈话，时间是1967年1月19日下午四点。

在江青缺席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贺龙讲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同时，周恩来还告诉贺龙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两段文字本别引自《贺龙传》和《不尽的思念》）

薛明回忆中还说周恩来告诉贺龙秋天的时候，他会去接贺龙。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周恩来忽然问起贺龙是不是和有的同志说起林彪的历史问题，贺龙承认在延安时间过林彪的历史问题这件事，周恩来没有表态，只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就够了”（参见《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第三卷，下册，498页）

周恩来当时向贺龙做了三点许诺，一个是缺少什么东西可以向他要；一个是“家里的事，

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还有一个就是周恩来会在秋天里接贺龙回来。

以上三点，周恩来第一点做到了一半，贺龙被专案组接管以后，周恩来就不再和贺龙联系了。第二点，周恩来基本做到了，贺黎明、贺晓明对此都做过回忆，正是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他们才得以和父母一度联系上。第三点则没有做到，到了秋天的时候，贺龙问题升级，周恩来已经无法可想。

贺龙走后不久，也就是1967年2月间，造反派对贺龙仍旧纠缠不休，薛明回忆周恩来做了两件事，她说：“2月18日，总理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2月22日，总理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这里面所说的中央应该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这时候还不愿抛弃贺龙，所以，把这时候对贺龙的保护全部算在周恩来身上也是不对的。然而，有一点是必须要说明的，那就是到底什么叫“大树参天护英华”。

一直以来，海外一些研究周恩来的人认为所谓的大树参天护英华是国内为了维护周恩来的历史荣誉所作的托词，而且，他们试图证明一点，那就是凡是毛泽东准备打倒的都是周恩来从来就没有办法保护得了的。这其实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行为，也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历史的行为。因为历史也者必须放在必要的历史背景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脱离历史背景考虑问题只能让问题变得无端复杂起来，于事无补。毛泽东决定打倒的对象周恩来当然没有办法保护，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刘少奇、陶铸夫妇等人周恩来还是尽量的减少他们肉体、精神上获得的折磨，这点已经有过回忆，这里不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的保护是基于什么标准进行的，这是了解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必要之处。

周恩来保护干部的标准首先是毛泽东、林彪不准备打倒的，而只是要烧一烧的，其次是业务干部为主，再有就是一些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周恩来在文革最初的三年之中保护了大

批的业务干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当时中央其他显赫的当权派比如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谁又做了比周恩来更多更细的工作呢？周恩来所保存下来的业务干部在以后的恢复国民经济或者说不至于让国民经济完全陷于瘫痪的境地起了不可替代与不可抹杀的作用。姚依林、余秋里、张加东、陈慕华、袁宝华、谷牧、吕正操等人都做过回忆，袁宝华在中央电视台摄制的大型文献记录片《百年恩来》中还专门提到了周恩来对他的保护的过程。

文革起来以后，主要就是打倒当权派，要改天换地，所以，当时占半数以上的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虽说毛泽东没有全部打倒他们的意思，可是，毛泽东要换马的意图则十分明显，凡是不能够积极配合文革的，毛泽东都要换掉。毛泽东发动文革，党内不同看法的很多，这点毛泽东自己也不讳言，他和阿尔巴尼亚的代表们说过：“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看法带进八届十一中全会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很多人仍然不通，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引自《风雨福祿居——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毛泽东主张对那些不懂政治行情的干部是要动手术，而这种动手术又是有区别的，一种是下不了手术台的，比如陶铸等人；一种是截肢以后再使用的，比如谭震林等人；一种是简单缝合的，比如谷牧等部长一级的中央所属的中层干部。

现在看来，似乎保护后两种干部都是轻飘飘的事，其实不然，靠边站的干部如果没有人给予支持、传递消息，毛泽东是不会知道你在什么角落里面的。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柴夫，他在延安时期做过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写的文章被毛泽东称赞为“清晰明理”，以后做过马列学院秘书长，文革中被活活整死，有一次，毛泽东和陈伯达说起起草报告的事情时，突然想到柴夫，说柴夫可以完成这种文章。他还问柴夫现在在哪里？陈伯达只好把柴夫死讯告诉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作罢。由此可见，像柴夫这个级别的干部（副部、副省到司局，

有时候也包括部分部长)，他们的生活并不全在毛泽东的视线之内，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样一个人出面给毛泽东提醒，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应该说是很难预料的，至少不会被解放出来的那么早就是了。1972年1月，萧克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毛泽东同意恢复萧克的党籍，周恩来借此提议让苏振华、张执一等人尽快出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在文革中做了很多这种因势利导的工作，虽说并不能扭转文革整体，可是在一些具体方面上还是起了比较好的作用的，为以后拨乱反正保存了一定的干部力量。

而周恩来所作的这些工作又都是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完成的，他还要面临着被指责被“老保”的风险，如果周恩来像林彪那样“主席画圈我画圈”的话，岂不是很省力、很省心？周恩来主动选择了这种工作，自愿挑起这样的担子本身就说明了周恩来的大局观，你可以说周是一个弥和的“泥瓦匠”，然而，周恩来的文革抢救运动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这也是研究晚年周恩来必须讲的一堂课。那些盲目给林彪翻案的人说什么林彪说过的话，周恩来也说过云云，那么请问周恩来保护干部的事情，林彪做过几次？我们经常讲听其言而观其行，从行动和结果的角度看，周恩来是无愧于大树参天护英华这个称呼的。

上面说了这些题外话的目的正是为了交待清楚周恩来在贺龙事件中为什么会扮演一个那么尴尬以致于让某些人诟病的角色。贺龙就是属于毛泽东准备截肢以后继续使用的，然而，由于环境的变化，他被很快归为第一类，下不了手术台了，周恩来对于这件事自然也是无能为力。一个第二号人物要打倒，第一号人物批准不要保的贺龙，周恩来一个第三号人物夹在中间能够发表不同看法吗？

还有一个时间通常不被外界关注，那就是1967年国庆节以后贺龙的一次住院治疗。贺龙因为高烧被周恩来指定送到267医院，而后又派杨德中前去看望。薛明回忆说：“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又去看了贺总，同时带来了总理亲切的关怀和问候。总理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总理是怕贺总再感

冒。贺总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象见到了总理一样。’”（引自薛明回忆文章《不尽的思念》）

原来周恩来是安排贺龙去住的解放军 301 医院，但是，受到阻挠，因为此时的贺龙已经被立案审查，贺龙专案组于 1967 年 9 月 13 日正式成立。贺龙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所以，这次住院其实是周恩来对贺龙的最后一次照顾，周恩来试图通过这种烧暖气的小事来表达自己对贺龙的最后的一点帮助。薛明回忆说正是在这次住院出院之后，他们和周恩来的联系中断了，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以后，贺龙已经被正式转交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中的贺龙专案组接管了。周恩来已经不可能对贺龙做任何分外的表示了，这时候主要焦点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还有一种说法是指周恩来是贺龙专案审查组组长，这是一种十分笼统的说法，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关于贺龙专案组一事我将在本系列中的第 14 节《贺龙专案组部分内幕》中给予介绍，这里只说一点简单情况，贺龙专案组是隶属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二办主任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以后又是黄永胜。而贺龙专案组两任组长分别是余立金和张秀川。（参见中共辽宁省委主编《共产党员》杂志内部版连载《文革专案大揭密》）贺龙专案组始终被控制在林彪的亲信空军系统与海军系统中。而贺龙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是身为第一副组长的空军司令部秘书朱铁铮，他在贺龙专案组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调查贺龙枪毙熊贡卿一事就是朱铁铮受命于林彪、叶群去完成的，集中“一切兵力揪出许光达”的五人小组组长也是朱铁铮。朱铁铮在结束贺龙专案以后因为立“功”和“能力”超群，还被调去罗瑞卿专案组审查罗瑞卿，而贺龙、罗瑞卿都是林彪曾经要百般拿下的重要人物，朱铁铮以后被林立果通过吴法宪提拔为空司二处处长，再以后因为成为小舰队成员被捕，从朱铁铮以后的境遇来看，贺龙专案组把持在谁的手中已经清楚了。周恩来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负责人，但是，不等同于周恩来就是贺龙专案审查小组组长，这两点是不能混淆的。

根据芦凤歧（贺龙专案组副组长）在以后的被审查时交待，周恩来在贺龙的专项审查材料中没有做过具体的批示，多数都是圈阅，林彪做过一次指示，但是，该指示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他只是凭借记忆说起来的。杨成武、余立金倒是对贺龙专案审查做过两次具体指示。

（后面将详细提及）而贺龙自己带的药物被上缴的指示正是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接手二办以后亲自找到贺龙组三位组长交待的。吴法宪、邱会作对贺龙专案都做过具体的指示。

而1967年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要求专案审查人员要打破一切现有的框架，要勇于“用造反精神对待专案”，要“背对背，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等。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说：“贺龙我不保了，不保了，他的秘书、司机都交待了，保不了，总理你还保不保呢？”周恩来说：“我也不保了。”八个月以后，贺龙含冤病故。

纵观整个贺龙事件，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中，他既不可能否定毛泽东的批准，也不可能开罪于林彪集团，他只能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毛泽东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打倒贺龙之前，给贺龙暂时提供一些宽松的环境，而同志之情、战友之情、朋友之情此时此刻都将在政治的严峻考验下颤抖。诚然，周恩来在贺龙一事上要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起因在于林彪、终结在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责任是服从和违心，也因此周恩来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对薛明说“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是发自周恩来内心的，这是周恩来自感对不住老战友的肺腑之言，虽说这种难过来的实在太晚。周恩来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即席发言，都不在预先设定的讲稿中，而且连续鞠躬七次，这反映了周恩来的一个高度自责的心态。

周恩来早年追求真理与革命，而晚年则不得不屈从于极左政策的推行，这里面有周恩来的历史局限性，也有我党的历史局限性，这不仅是周恩来的巨大悲剧所在，也是我党在那个

黑暗年代中的巨大悲剧所在。一个人、一个党派的悲剧进而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这个沉痛的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吸取。

13.毛泽东批准打倒贺龙

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之间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政治蜜月期，在此期间，林彪拥护毛泽东达到他一生的顶峰，而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虽说中间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调，然而，总体上毛泽东对林彪是相当看重的，毛泽东、林彪同盟在为了达到文革的最初目标是不遗余力的。

毛泽东自己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去，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办好。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七卷，112页）这个建议尽管是刘少奇提出来的，然而，却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可是，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其他几位的副主席则不再被提及，只有林彪一人成为副主席，而在中央全会上直接被明确为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林彪是党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位，稍后九大以党章的形式把林彪固定为接班人，更是中共建党以来破天荒的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也就难怪林彪要在十一中全会上说出那么一番诚惶诚恐的“谦虚”的表态讲话来，同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等人相比，林彪的资历是最低的。一跃而为毛泽东以下的第二号人物，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其时的借重与看重。

1968年3月25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吴法宪、黄永胜、温玉成等人时，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要林彪直接抓在手里，军委办事组就是军委，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赋予林

彪在军队中的优越地位。（参见《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2 月第 1 版，317 页）所以，林彪就在这张王牌之下，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大力提拔不仅直接控制了总参、总后和海军、空军，还终于在九大进入决策层，形成林彪集团的基本框架。

因而，林彪整贺龙从一开始毛泽东的倾向性就是很明显的。贺龙同林彪之于文革之初的毛泽东孰重孰轻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1966 年 9 月 8 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说贺龙是“要夺取政权”，“贺龙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全文引自装甲兵党委 1978 年 7 月 6 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大将许光达》，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一版注引 379 页）

林彪的上述指责就在贺龙即将去林彪处解释之前的两天，所以，林彪对贺龙所说的“今后支持谁反对谁”其目的显然很清楚。而贺龙的“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回答与林彪的要求实在相差太远，这种空泛的回答当然等于堵死了林彪和贺龙之间最后的“沟通”。

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调解失败以后，还没有准备对贺龙采取什么样的处置。1967 年 1 月 19 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周恩来、李富春、江青找贺龙正式谈话，等于把贺龙的问题点了出来，而后贺龙搬走，这时候贺龙的待遇还在维持阶段，还允许自己带着药物，管理上由中央办公厅杨德中负责，没有吃什么苦头。比起当时各地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呜呼哀哉相比还是相对不错的。1967 年 7 月，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对杨成武还提及贺龙，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这说明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整倒贺龙。而此前朱铁铮奉林彪、叶群之命在 6 月 13 日调查贺龙通敌的情况。这份报告出来以后没有马上交给毛泽东，交给毛泽东的时间是七二零事件以后。

武汉七二零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对文革的估计在 1967 年“一月风

暴”以后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还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大谈如何结束文革如何恢复正常的话，可是，出现的两次突发事件让毛泽东扭转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个是怀仁堂的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毛泽东自谓信得过的原八届中央政治局中硕果仅存的三副四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都是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竟然对中央文革发难，而陈毅旧事重提居然敢于对延安整风提出质疑，谭震林大胆的提出对江青、张春桥的批评也是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的，毛泽东对于文革的斗争的顺利程度开始有了慎重的估计。这次二月逆流也是动摇了毛泽东对以往他的一些老战友的信任。

此后，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林彪在第一时间里面把七二零事件确定为反革命暴乱，并且大有深意的指出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这次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毛泽东素来对历史上的纠缠比较敏感，每一次政治斗争中毛泽东都大谈特谈某人在历史上的山头与主义，像五八年的反教条主义和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等，林彪的这一指点马上就把毛泽东在6月时对某些事态的看法给打了折扣，毛泽东曾经愤愤的说“我算是掉进了贼窝里”（参见董保存《杨余傅事件真相》）

七二零事件之于毛泽东最大的体会是军队内部还不十分稳定，军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唯一支柱力量，如果军队不稳，毛泽东当然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毛泽东尽管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批示了大大大毒草的字眼，可是，这件事在毛泽东内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也就是在这次事件以后，毛泽东对于那些敢于对文革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或者不积极配合的老同志们改变了他以往迁就的态度，决定对他们予以必要的清洗。

七二零事件之后两个月，贺龙就被专案审查就是说明了这一点，而此前这件事尽管多次报请毛泽东始终没有回复，8月底，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对贺龙进行专项立案审查。9月13日，贺龙专案组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麾下的第二办公室归口管理下成立。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初期政治斗争更加扑朔迷离，3月打倒杨余傅以后，毛泽东对

贺龙不再保了，第一次点了贺龙的名字。当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交来的《关于深挖叛徒的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中央、国务院和军委以及文革小组转来的，毛泽东亲笔批示一段十分重要的话，他写道：“刘邓陶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蔽在党内，窃据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务，结成了叛徒集团。”（毛泽东批示引自《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 523 页）很具讽刺的是，贺龙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彭德怀审查委员会主任，而现在他居然紧跟彭德怀之后成为第五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8 年 6 月，毛泽东在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中继续批示贺龙为走资派，此时贺龙的位置更加“上升”，成为刘邓陶之后的第四号“反革命修正主义者”。该批示四天以后，毛泽东圈阅同意下发中发(68)71 号文件，这份文件中正式指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贺龙这时的代名词成了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

1968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再度当着常委以及林彪、周恩来的面说他不再保贺龙了。彻底抛弃了贺龙。而随之而来对贺龙的政治迫害进一步升级。不过，有一件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当建议处理贺龙的女婿 47 军负责人李振军报告报到毛泽东这里时被毛泽东压下了，李振军以后还参加了湖南省的具体领导工作。而贺龙的亲家之一的廖承志在被批斗时，周恩来秉承了毛泽东的意思加以保护，使得廖承志没有受到灭顶之灾。曾志在她的回忆中提到毛泽东曾经区别对待她和丈夫陶铸，然而，知道毛泽东和曾志关系的都应该知道，毛泽东与曾志有比较长的历史渊源，他们很早就是战友，彼此也比较谈得来，所以，毛泽东顾念当年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李振军同毛泽东又有什么渊源呢？即便不予打倒，也无需以后的重用，叶剑英下放湖南时也正是李振军给予照料，而叶剑英在批斗贺龙“团伙”最

严重的时候居然还能让王尚荣到自己家里吃饭，也是一件挺不可思议的事情。联系到廖汉生的“四大罪状”中一条就是和杨尚昆的亲属关系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毛泽东压下这份报告的另一层考虑，当然，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我们已经很难作出十分确定的结论了。

可以说，在打倒贺龙这件事上，林彪是始作俑者，然而，假如毛泽东不同意的话，林彪也终于不能奈贺龙何，可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和林彪站到了一起，并且最终批准打倒了贺龙，也就是说在贺龙冤案中毛泽东需要负主要责任，如果仅仅是林彪等人的鼓噪，贺龙是不会屈死的，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对贺龙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但是，正是由于毛泽东批准打倒贺龙在先，所以，此后对贺龙的种种折磨也都是据此而来。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林彪在贺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罪恶的，他为了谋求和巩固自己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对于贺龙不惜采取诬陷、栽赃等一系列卑鄙的手段，而贺龙在被专案组接管后，也正是在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指使下一再对贺龙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最终导致贺龙含冤而死。（后面在贺龙专案组中将详细谈及）以往，我们一些党史作者喜欢为尊者讳，把本来应该属于毛泽东的责任的一律推到其他人身上，似乎毛泽东一直被蒙在鼓中，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而现在网上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盲目为林彪等人翻案，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重重罪恶一笔抹杀，描绘成为一个“一清二白”的干净的“无辜者”，相信这也将是徒劳的。

14.贺龙专案组基本构造

文革中的专案组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组织，虽说它是临时性的，然而，它却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在 1967 年夏季成立的，其成员来自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而

碰头会也是中共自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组织形式，特别是这样一个碰头会居然是原来的政治局、书记处的联合体，更是极为罕见。这个形式最早是周恩来在 1967 年 2 月 2 日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提到的，周恩来一共提了三点，随后这种形式被毛泽东批准使用，成为研究党政军业务的主流或者说唯一具备最高权威的会议。

碰头会的主要成员和列席成员包括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汪东兴、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黄永胜、戚本禹、温玉成等。中央专案审查领导小组成员也从碰头会成员中产生，康生担任顾问，他和江青、叶群等人实际是专案审查小组中的灵魂人物。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面设立三个办公室，简称一办、二办、三办。

中央专案审查一办（第一办公室）主要负责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一办的主任是汪东兴。

中央专案审查二办（第二办公室）主要负责军队系统内部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二办的主任最初是杨成武，以后是黄永胜。

中央专案审查三办（第三办公室）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主任是谢富治。

以上三个办公室都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负责（请注意，不是对政治局负责）。

（以上引自中共辽宁省委主办《共产党员内部版》连载《文革专案大揭密》）

贺龙专案组成立的时间是 1967 年 9 月 13 日，组长是余立金，第一副组长是朱铁铮，朱铁铮也是来自空军，系空军司令部秘书。副组长芦凤歧，他来自北京军区。成员中多数来自空军系统，所以，尽管吴法宪不是贺龙专案组主要领导，但是，他却可以指挥这个专案组。余立金本人尽管以后被林彪等人整垮，然而，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余立金却是运动中的红人之一，并且对于林彪的指示也是一体凛尊。

专案第二办公室的主任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以直接对专案审查作出指示，也是上传下达的重要角色。

根据《文革专案大揭密》中介绍，杨成武一共管理九个所属的专案组，包括贺龙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主要是针对叶剑英）、肖华专案组、马明方专案组（马明方系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无线电专案组、饶漱石专案组、谭震林专案组。中央专案审查二办的总据点设在北京翠微路总参谋部第二招待所里面。

贺龙专案组下面还设立了若干其他专案组，在于处理与贺龙一案有关的其他高级将领，它们包括：

- 1.许光达专案组（装甲兵）
- 2.王尚荣、雷英夫专案组（总参）
- 3.金如柏、李贞专案组（总政）
- 4.陈鹤桥、樊哲祥专案组（通信兵）
- 5.谭友林专案组（工程兵）
- 6.廖汉生专案组（北京军区）
- 7.黄新廷、郭林祥专案组（成都军区）
- 8.杨秀山专案组（武汉军区）
- 9.张仲翰专案组（新疆军区）
- 10.成钧、向黑纓专案组（空军）
- 11.荣高棠专案组（国家体委）

（引自《文革专案大揭密》，所以，此段用纪事字眼，不用原创字眼，请注意）

15.血洗许光达

贺龙专案是杨成武二办当时最大的专案，虽然在二办中还有谭震林、彭德怀、肖华的专案，但是，谭震林专案的牵连范围远没有贺龙那么多，肖华并不是军委副主席，更没有长期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显赫地位，彭德怀早在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就倒台，随后在 1962 年被设立专案审查，属于“死老虎”之列，和贺龙的量级不能同日而语。

贺龙专案中牵扯到的高级将领们属秦基伟、许光达比较特殊。秦基伟特殊的在于他并不是历史上贺龙的嫡系，而且，从工作角度出发，他和贺龙共事的时间几乎等于零，然而，他却作为贺龙专案中被调查、审查乃至劳教时间最长的一位，时间为七年。连廖汉生也不过五年多的时间。

这是为什么呢？秦基伟的妻子原来是贺龙帮助介绍给秦基伟认识的，而且，他的妻子原任西南军区保卫干事，就因为这么一条，就把秦基伟作为贺龙的“黑线上的骨干”给无端关押了七年之久。而秦基伟和贺龙之间的联系人就是秦基伟的妻子，这些今天看来比较滑稽荒唐的理由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却成为搞掉一位开国名将的主要证据。

继秦基伟之后的就是许光达，许光达在历史上追随贺龙比较久，也是贺龙所谓的干将中军衔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贺龙本人作为修正主义者尚没有受到肉刑，而许光达则一直遭到毒打直至惨死。我们曾经走访过许光达将军的儿子许延滨同志和许延滨同志的妻子曾正魁同志，他们为许光达大将之死提供了不少翔实的资料，使我们得以通过这位开国元勋的死于非命看到文革中最为惨烈、阴暗的一幕。这也同时对那些目前试图通过一些所谓“服从”“不得已”等托词给林彪、吴法宪、李作鹏诸人“洗清罪名”最为有力、有实的回应。通过许光达一案，让更多的人看清吴法宪、李作鹏乃至林彪之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剥去少数人套在他们身上的层层伪装。

许光达自从 1930 年 2 月开始跟随孙一中（孙德清）、周逸群等人在洪湖地区开展革命。

1930年7月，他开始跟随贺龙，此后在长达十八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与贺龙的关系一直比较深厚。然而，在贺龙专案组中，像许光达和贺龙的这种渊源并不是什么罕见的，可是，许光达所受到的“特殊关照”却是绝无仅有的。从贺龙专案组组长余立金到空军司令、专案组的“太上皇”吴法宪，还有海军政委李作鹏乃至林彪对许光达都做过具体的批示，吴法宪等人甚至对如何斗争许光达也做过过细的批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许光达为人正直、耿介，他是十位大将中最为年轻的一个，在1955年授衔前后，他曾经主动要求给自己降级、降低军衔，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赞扬。在中央布置反右倾运动的关键时刻，许光达毅然挺身而出见毛泽东提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不正常的现象，说如果继续这么做下去就要天怒人怨，这种不多见的抗上的行为出自一个和经济领导范围无关的装甲兵司令员之口多少反映了许光达的某些性格鲜明的一面。

林彪上台以后，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搞了一个非驴非马的四个第一，这是许光达不愿意服从的。许光达并不是一个漠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高级将领，相反他对于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抓的很紧，王杰事迹就是许光达推出来的。然而，许光达一直强调的是“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这被林彪等人说成纯军事观点，而八十年代我国军事权威在论证许光达在建设装甲兵的过程中的很多观点都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许光达本人也是身体力行，1959年，他以51岁的年龄到北京郊区的坦克学校学习驾驶坦克。在突出政治这件事上，许光达和林彪有过不同的意见，许光达在事后说了一些对突出政治有意见的话，随后被人反映上去，那时候政治空气还没有那么紧张，可是，到了1966年就不同了。

1966年8月，26军政委程世清给林彪写信，称许光达对林彪最不满、最仇恨，还说许光达有“里通外国之嫌”，“一旦有事，就是一个最大的危险人物”。

程世清，河南新县人，1918年出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中担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此人是林彪的走卒之一，他对许光达的揭发等于给林彪打击贺龙提供了炮弹。

就在程世清的揭发信发出以后一个月以后，也就是 1966 年 9 月 8 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点名许光达，说“贺龙准备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林彪的这个点名给以后审讯许光达定了总调子，根据芦凤歧后来交待说他在第一轮审讯时就问及许光达是不是已经被贺龙内定为总参谋长了？贺龙专案组以后按照林彪的这个讲话把许光达定为贺龙一案中的第二号人物，是贺龙兵变的“总参谋长”。（参见《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1978 年 7 月 6 日装甲兵党委给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报告，注引《大将许光达》，381 页以及《文革专案大揭密》）

1967 年 3 月 6 日，装甲兵党委向全军文革小组请示“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斗对象”。7 月 5 日，装甲兵政治委员黄志勇主持装甲兵党委工作会议，决定在装甲兵内部成立“斗许、张专案组”，这是以后许光达专案组的雏形。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组长，自然谁的专案他都负总责，周恩来在贺龙专案的批示就是改了若干个错别字，至于张宁所说的林彪在贺龙专案批示几乎是零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张宁是什么身份，能够知道林彪在贺龙专案上的批示？张宁在她的回忆录《尘劫》中说她问了专案组的人说林彪没有在贺龙一事上作出批示，那么谁来证明林彪没有作出批示呢？谁来证明张宁不是在说谎呢？倒是有很多人证明周恩来没有在贺龙专案上做过具体应该怎么做的批示，也有很多人证明并且也有文件资料证明林彪及其同伙吴法宪等在贺龙专案中所起的恶劣作用。

装甲兵内部一向比较复杂，特别是政委黄志勇其人本身就是一个整人专家，用徐向前的话说，此人从延安时期就是搞逼供信的那一套。（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这次许光达被扣上反对“林副主席”的帽子以后黄志勇自然要特殊的卖力气，不仅黄志勇如此，林彪手下的几大干将人人如此，例如吴法宪、例如邱会作、例如李作鹏，可谓陆海空三军一起动员，全然一副立体化阶级斗争的模式。

吴法宪对许光达一案的重要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

李作鹏的批示是：“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

邱会作的批示是：“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许光达大将亲属许延滨同志采访笔录、薛振先犯罪交待记录，另外可参见《许光达大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 1 版 379 页）

当许光达被批斗昏倒以后，有人把许光达送进医院以后，在请示报告上，吴法宪批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就这样，在许光达两次住院期间，专案组一共第一次审讯 79 次，逼写材料 25 次，出院以后的 21 天中被逼写材料 7 次，审讯 8 次。第二次住院 33 天，被逼写材料 2 次，审讯 6 次，之所以这么少，因为此时的许光达已经濒临死亡。在吴法宪的这个批示下，许光达临死前三天还被专案组逼下跪向毛泽东画像请罪一次。（吴法宪批示原文引自《许光达大将》该书 379 页）

正是由于吴法宪的“刺刀见红”的一说，专案组才提出要“血洗许光达”。至于生活作风一贯败坏的“花花部长”邱会作给许光达一案的最大贡献是照搬他在总后搞专案的的经验之谈。邱会作在总后曾经叫嚣过这样一些口号“要学蒋介石！要学打砸抢！要斩草出根！死了省了麻烦！”1968 年 2 月 27 日，邱会作亲笔批文规定总后办案的“三狠”方针：“我们的就是要打倒他、消灭他，这是搞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对那些拒不交代的人就没办法吗？应当是有办法的。……应当狠斗（坚决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邱会作让人把这个“三狠”方针介绍到许光达以及贺龙专案组中来，当时的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徐浩（继任者）心领神会。同时，邱会作的总后专政机器还给许光达乃至贺龙专案组贡献了一个招法，那就是找来一些装甲兵

医院的男护士作为打手和专案组工作人员,这些精通人体知识的男护士们是非常知道怎样殴打“犯人”才能造成严重的“内伤”而表面上则很难看出来。(参见《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 505 页, 经济日报出版社》)

邱会作的总后专案机器比之装甲兵丝毫不逊色,根据肖思科同志的介绍,“从 1967 年至 1971 年,邱会作在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直接迫害干部群众四百六十二人,致使汤平、周长庚、顾子庄、张树森、申茂臣、张凌斗、华迪平八人被迫害致死。”而最令人发指的是邱会作等人发明的刑讯特色更是惨绝人寰,根据不完整的统计一共有以下 23 种刑罚:

- 1、车轮战: 日夜连续审讯。
- 2、低头弯腰、罚站。瞌睡得碰墙壁;
- 3、下颏顶茶杯: 把两个茶杯摞在一起, 下边放在衣扣上, 上边顶着下颏, 使他不能动;
- 4、坐高低凳: 叫他坐在一个矮木凳上, 两脚放在桌上, 两小时不能动, 只能用手扶桌子凳子;
- 5、作“体操”: 身体靠墙, 两手揪耳朵, 上上下下, 一站一蹲;
- 6、“打反骨”: 用棒子打后颈骨, 造成很长的时间抬不起头来;
- 7、打嘴巴;
- 8、刮伤: 在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 再用木棍拨弄伤痛的地方, 增加痛苦, 十分残忍;
- 9、“吃元宵”, 集体拳打: 审查人员站在四周, 被审人员站在中间挨打, 周围你一拳, 我一拳, 捅来捅去;
- 10、用劈柴、扫把打: 打双肩、脖颈、屁股、踝骨, 致使皮肤红肿、溢血、溃烂, 现还有紫色伤疤;
- 11、脖子上挂椅子、凳子并加砖头: 将椅子倒立后从背后挂在脖子上或挂铁凳子, 在椅子底部加上砖, 或脖子上套铁丝, 两边各挂

三块砖，也有时双手各拿一块；

12、“捏羊蹄”：将手指屈曲后用大拇指猛压指甲处，痛得在地上打滚，不让喊出不还用擦桌布堵住嘴。捏后手指溢血、青肿，致使被捏的手指变形；

13、让被审人员站在砖上，将手腕、大小指用纱布捆起来，吊在地下室天棚上，然后将砖去掉，脚离地面。曾掉下过多次；

14、双手举铁凳：双手将二十多斤重的铁凳举起，因支持不了，只好慢慢套在脖子上；

15、烟头烧踝骨。至今留下黑色伤痕；

16、逼着吃带粪便的馒头，造成中毒性的痢疾，险些死亡；

17、拧大腿肉：看守者（注：利用犯人看守）用指甲掐他大腿内侧。

18、逼自己打自己：看守打人是经常的，有时不愿打了，就逼着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9、强制在身上练针灸：看守为学针灸，以治病为名，在身上多次练针，想扎哪就扎哪，乱扎一阵，还不准反抗；

20、头顶大碗：为折磨人，曾几次用大碗装满凉水，顶在头上，每次半小时左右，还不能用手扶；

21、限制喝水，逼喝脏水：天热口渴，多次要求喝水不给，逼着喝洗脸水；

22、烟头烫嘴：不交代问题，审查人员就用烟头烫嘴；

23、捆在椅子上：为了不让走动，就用绳子将两手捆在椅子上。

（以上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

这些在今天看来让人瞠目结舌的丑恶的东西在当时那个黑暗年代则被奉为圭臬，许光达专案组“欣然”接受了其中的部分刑罚，但是，装甲兵专案组还有自己的看家特色，自然对于许光达来说，他们会不吝“赐教”的。

杨成武、肖华、余立金的另副嘴脸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包括林彪在内都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换言之也就是被国内批臭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怎么揭露也不为过。可是，目前仍旧被官方列为正面歌颂的一些人在贺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是大家非常希望看到的，他们在文革中的嘴脸是不是像当前某些党史资料说的那样“坚强不屈”或者“大义凛然”呢？显然不是，只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某些人在这起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大悲剧中的作用还属于禁忌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些人的表现的探求也就显得十分的繁琐和复杂。

贺龙专案组是杨成武一手负责的，特别是在1967年9月到1968年2月这一段时间是贺龙专案组调查取证的比较关键的时候，这期间杨成武对于贺龙一案是十分关注的，而且不仅关注，还做过具体的指示。芦凤歧后来在交待材料中说，杨成武曾经对他们专案组办事不力大发光火，杨成武说你们对贺龙一案很多问题都挖的不深，“办案不能大刀阔斧”，“许光达一案也办的不得力”等等。而且，芦凤歧还交待说杨成武当时的脾气大的很，把他叫起来当场训斥了一顿，芦是贺龙专案组的常务副组长，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虽说也有给自己遮羞的水分，但是，对于杨成武这个量级的人物的讲话、指示应该不会胡乱编造的。

杨成武是文革初期的“红人”之一，他一度还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的“联络员”，特别是在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杨成武口含天宪，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给北京，俨然是毛泽东的代言人。徐向前被任命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通知就是杨成武负责向徐向前交待的，由此可见杨成武当时的显赫地位，更为奇怪的是，杨成武向徐向前说他不方便去徐向前那里，让徐到总参五所来听通知，徐向前夫妇只能照办。时间是1967年1月6日。（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580页）

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被囚禁时，一次应专案组的要求说起他的所谓散布林彪身体健康“谣言”时不经意的波及到杨成武和肖华时立刻被专案组制止，说他侮蔑首长，于此也可见

杨成武那时的实际地位。

除了杨成武以外，还有肖华、余立金等。肖华是深得毛泽东、周恩来信任的“红小鬼”，肖华 18 岁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是周恩来提议的，周恩来说肖华值得信任。1933 年年初中央在宜黄县召开会议，期间敌人的飞机来轰炸，周恩来亲自救了肖华。（参见《周恩来和共和国将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第一版，该书 269 页）

1967 年 1 月 29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时还力保肖华，周恩来说“肖华犯错误是不自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3 月 3 日，周恩来再次指出，造反派抄肖华的家是一股妖风。（参见原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回忆录《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史出版社 1998 年 2 月北京第一版）

而肖华本人又是王光美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又是全军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杨勇因为和肖华不和，把批肖华的文件传达到排级以后，战友文工团造反派去抓肖华，消息传出来以后，林彪震怒，要火烧杨勇，明确指出要烧焦。这是叶剑英向徐向前说的。

（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至少在肖华被打倒之前，林彪对于肖华是保护的。

徐向前还回忆说肖华在 1967 年 3 月 24 日“过关”以后，代替他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如果不是后来肖华本人因为一些突发事件以及同林彪的几个亲信之间的矛盾，肖华还会继续保留他的地位的。

还有余立金，余在杨余傅事件中含冤落马，然而，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一贯反对林彪所致，用杨成武的话，那时候巴结林彪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对呢？余立金不仅没有一贯反对林彪相反对林彪交办的事情非常认真。许光达被捕以后，一度发现他住的地方有异物出现，余立金就大发雷霆，呵斥专案组成员，以后，他亲自找到黄志勇，让黄志勇从装甲兵那里抽调一些干练的骨干来对付许光达，像都曼林、党志壁这几个人都是这时候调过来的。可见，余立

金在落实林彪的指示和配合林彪对贺龙的打击上也是不遗余力的，以后他和吴法宪之间出现争宠的矛盾则又另当别论了。

从我党的一部党史来看，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有过被整的历史以及整人的历史。我们作为后来者评价、看待这些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时，不能因为他被整过就试图说明他的整人是合理的，也不能他整人就抹杀他被整时的冤屈。而梳理历史的痕迹、脉络，尽可能的展现每一个参与者在斗争的全过程的表现才是我们应该力争做到的。（其实不一定能够做到，也只是在某些方面做一些补充的工作而已，真相还有待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前进后才可能被澄清）

这是许光达专案话题中的一个小插曲，作为侧面出现在这个系列中，请注意。

许光达被捕以后，他的生活秘书陈志文立刻和专案组配合起来抄家，连 1938 年许光达给夫人邹靖华的情书也被抄走，许光达的儿媳妇曾正魁回忆说，她当时被北京钢铁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抓走送到专案组，她进入刑讯室以后，发现一个人刚刚被打死在地，而这时曾正魁已经是一名孕妇了，让孕妇直接面对死者的狰狞正是专案组的杰作之一。目的在于让曾交出所谓的“二月兵变”的黑名单。北京钢铁学院追杀许光达家属的事情被周恩来知道以后，遭到周恩来的制止，曾正魁这才有机会生下了许雪青。

许光达在专案组中的追逼之下态度一直不是很好，目前公布的许光达的所谓的交待材料，通篇都是引用的毛泽东的一些警句和名言，还有就是一些含糊不清的话，比如“一切依靠帝国主义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猻散，全局就改观了。”这句话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所以，许光达专案组后来的组长徐浩、副组长姜永兴对许延滨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谁和他去谈话他都骂人。”

那么，专案组是找许光达谈话吗？根据 1978 年 7 月 6 日的装甲兵党委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中称，许光达被抓以后，从 1967 年 12 月开始

被批斗，经常遭到罚站、弯腰，其中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车轮战，三天三夜没有让许光达休息。贺龙专案组常务副组长芦凤歧指示把许光达的伙食标准下降为标准犯人，每月不得超过12元。半个月后降到8元。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原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率先武斗，把许光达打昏。

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为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对许光达大打出手，以致于许光达口吐鲜血，另一位专案组成员都曼林因为殴打许光达有功被提拔为兰州部队某军副军长。

倍受折磨的许光达于1969年6月3日晚上十点在没有任何看护人员的情况下，惨死于马桶之上，死因至今没有完全落实。早在许光达死前，周恩来就做过指示要对许光达的身体做深入的治疗，这是周恩来在对罗瑞卿专案组成员谈话时提及的，以后许延滨又给周恩来写信，但是，信被退回许延滨处。

许光达死后不过一周，贺龙也走到了他的生命的尽头。

16.斗臭王尚荣

林彪给贺龙的所谓兵变企图画了一个“蓝图”。在这张图上，许光达是“总参谋长”，成钧是“空军司令”，廖汉生是“负责北京军区和卫戍部队”，而总联络员则是王尚荣。这里面以上几个人的头衔是打倒之前就安装完毕，只有王尚荣是被打倒之后补发的。而且，在文革中，像总参二级部部长这一级的干部能够得到“林副统帅”的次最高关照的恐怕（最高是统帅）王尚荣怎么也算比较突出的一位，等到王尚荣倒了以后，特别是整贺龙以后，林彪要斩断贺龙的羽翼的意图开始完全暴露出来，而王尚荣之倒台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顺便说一句，王尚荣是贺龙二方面军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将领。

王尚荣，中将军衔，湖北省石首县人。15岁开始就参加了贺龙、段德昌的红军。以后

历任红三军司令部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第五师十五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独立第一旅旅长，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一军副军长兼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

王尚荣为人风度翩翩，相貌出众。王尚荣、黄克的红娘罗瑞卿曾经说过王尚荣要是不参加革命也能在社会上找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他长相英俊。王尚荣本人曾经有一张早年拍摄的照片，适时，王身穿军装，侧过身去，左臂微微弯曲，右手拿着一支铅笔，站在军用地图前面，就是这么一张照片居然瞒过了邓颖超，在周恩来逝世以后，在选取周恩来生前照片时，王尚荣的这张旧作被当作周恩来的照片选用了，以后邓颖超才知道，因此特意向王尚荣致以歉意。（此事引自邓颖超秘书赵炜、王尚荣秘书李锦生口述回忆）

王尚荣不仅相貌出众，而且才能也比较出众，他在南京军事学院进修期间，从不轻易夸奖他人的刘伯承院长对王尚荣特别欣赏，许之以国家未来军事全局指挥人才。周恩来请刘伯承推荐几位学员到总参工作，刘伯承专门提及王尚荣，说他是“尖子”。此后，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多次的奖掖，在台海作战、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都出色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晚年的王尚荣仍旧老当益壮出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总指挥部中，给越南人送了“一记狠狠的耳光”。（引自李先念语，刘亚洲口述回忆）

然而，进入文革以后，王尚荣的处境变得越来越恶劣起来，由总参“八二五事件”作为导火索，王尚荣就此被打入另册，长期遭到非人的待遇。

总参八二五事件的起因是总参外事局群众反对总参外事局局长潘振武（又作国防部外事局局长）作为毛泽东在1966年8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作为毛泽东的外事引见人之一。（当时陪同的还有杨成武等人），其中外事局参谋孙启

祥还自称代表总参外事局群众向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反映潘振武的问题。根据王尚荣的秘书李锦生回忆，此外，外事局的所谓群众还写了一张大字报让副总参谋长王新亭签字，他们本来要找杨成武，杨成武不签字，他们就找到王新亭，让王签字，王也不签字。

于是，他们就向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反映，如果是普通的外事局群众是根本不可能轻易见到徐业夫的，徐业夫也不会轻易给他们转达意见到杨成武那里，更不会因此告诉毛泽东本人，可见群众背景和来头之大。而群众能够让王新亭签字也是一个苗头，王新亭是当时当红的副总参谋长，后来全军文革成立以后，王新亭担任副组长，名字仅仅排在肖华、杨成武之后，林彪曾经亲自表扬王新亭是“大义灭亲”，联系到王新亭历史上四方面军的出身，应该知道这个大义灭亲到底是语出何处了。正是背着这样一个历史包袱，所以，王新亭在历次政治斗争中都作为先锋人物冲在前面，借以表达他比一方面军更为尊重毛泽东，更为紧跟林彪。

外事局的群众见王新亭也不愿意签字，就找到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王尚荣当时正在值班，外事局的群众就让王尚荣在大字报上签字，王尚荣说要通过杨总长再说，可是群众不答应，王尚荣就签字了，不仅他签字了，同时值班的另一位作战部副部长也签字了。

就杨成武而言，他对王尚荣是比较欣赏的，刘少奇向他转达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代总长时，杨成武就推荐王尚荣，杨成武说：“如果非要我来代，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引自董保存《杨成武在政治漩涡中》）而潘振武又是杨成武比较欣赏的干部之一，杨成武本人就不同意撤换潘振武作为引见人的这个主意，王尚荣为什么会签字呢？关于这一点，王尚荣的秘书和家属回忆都说是当时群众逼人太甚，王尚荣被纠缠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签字的，可是，这个解释虽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是事实的真相。

根据许世友的警卫员回忆，杨成武以后再和许世友、王尚荣见面时曾经提及这件事，他

说即使八二五事件不发生，你（王尚荣）也一定要出事，有人惦记你的位置很长时间了。（引自吴东峰采访许世友警卫员、秘书口述回忆）这里的有人杨成武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所以，我们也只能存疑。

原总政治部二级部部长陈虹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作战部部长、副部长等带头签了名。”（1999年第九期《党史博览》《总参八二五事件》）这同李锦生的回忆有些冲突，李锦生回忆说王尚荣是在外事局的大字报上签字的，不管怎么说，这起事件王尚荣是直接参与的了。

这之后，周恩来给总参发来信，抬头写的是杨成武转，原信根据陈虹的回忆文章，摘录如下：

杨成武同志转告总参谋部各部、局党委：

昨(25)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杨成武同志向我反映，总参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杨成武同志同意这一要求，并向我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于事后报告了主席。可将这一情况转告有关同志。

周恩来

1966.8.26

就在周恩来发信之后的次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也写来亲笔证明：

总参党委：

8月25日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之前，总参外事局孙启祥同志打来电话说，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我当即报告了杨成武请他决定。这时总理已到，他即向总理反映了我

接外事局电话的情况，并向总理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总理当时同意了杨成武同志的意见，并及时告诉了潘振武同志不要参加了。

此致

敬礼

徐业夫

8月27日

（注：徐业夫原信也是摘录陈虹回忆文章《总参八二五事件》一文）

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随后在8月30日，在叶剑英主持下，肖华、张爱萍、王尚荣等人都参加了一个会议，旨在澄清八二五事件，在会议上，王尚荣做了自我批评，叶剑英也澄清了王尚荣签字的动机，叶帅晚年向范硕、王文理回忆说，那时候他希望把王尚荣摘出来，因为有人觊觎王尚荣的位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杨成武在会上也保了王尚荣，这件事看起来应该不会再有太大的风波。

然而，在周恩来发出所谓夺权的暗示以后，林彪很快也介入了这件事，林彪在文革中不是什么事都介入的，更很难就某一事件表态甚至讲话，可是，这件事上林彪很快作出反应，并且说了大篇幅的指示。像王尚荣签字这件事其实在文革初期并不是罕见的，当时农垦部始终没有大字报针对部长、副部长，于是，负责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就找农垦部副部长肖克谈话，“启发”肖克，从而让肖克去贴部长王震的大字报，结果肖克照办，结果农垦部大乱，王震看到肖克的大字报以后接着就把肖克的历史问题揭发出来，从二四方面军会师到五八年反教条等等不一而足。（详见《王震传》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可是，林彪很快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来办，接着发表重要讲话，林彪说：“总参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尚荣要一挖到底，要穷追不舍，要斗倒、斗臭，要罢官，宁愿提拔一个连长当部长，也不能要这些人。”（林彪原话引自王凡、李锦生合写《王尚荣在文化大革命

中》，载于《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卷二，该书 101 页、102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林彪的这篇讲话也得到了军委其他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的首肯。陈毅没有到会，事后也没有向陈毅传达，直到王尚荣撤职的文件送到陈办时，陈毅才知道此事。

林彪此话一出，王尚荣马上倒台，王尚荣被捕以后，专案组找他谈话的第一句就是问你和廖汉生、许光达去贺龙家里说了什么？你要是勇于和廖汉生、许光达划清界限。王尚荣则证明他从未同廖汉生、许光达一起在贺龙家里见过面。

贺龙一案升级以后，专案组再找王尚荣谈话，让他交待吹捧贺龙的“犯罪事实”，王尚荣说他只说过贺龙在林副主席不在的时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关心干部，顾全大局。没有说其他的。此后，专案组让王尚荣写出他背后散布林彪身体不行的谣言，王尚荣说这都是杨成武、肖华告诉他的，说林彪副主席身体不好，怕风怕水什么的。专案组立刻让王尚荣闭嘴，不准攻击杨成武、肖华两位首长。

等专案组将王尚荣交待的材料汇报上去以后，马上传达吴法宪的一个批示叫整他的态度，意思是说王尚荣态度不老实。于是，专案组成员对王尚荣进行多次毒打，毒打中，专案组成员说：“你不是美男子吗？专打你的臭美作风。”王尚荣下身遭到严重破坏，一只睾丸被打的萎缩，另外一只则被打得水肿，落下了生理上的残疾，终身未愈。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问起王尚荣的情况，把王尚荣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 1974 年 7 月底批示，要杨成武、余立金、王尚荣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王尚荣这才解除监禁。

17.囚禁廖汉生

廖汉生是贺成妹（贺龙二姐）的女婿，也就是贺龙的外甥女婿，以前有人一直说廖汉生

是贺龙的外甥，实属不确。以后，廖汉生和杨尚昆的五妹白林结婚，仍旧和贺龙保持一种类似于亲戚的关系，用廖汉生自己的话说，他去贺龙家，就像走亲戚一样，不用电话通知，也不用在乎他们家里谁在。再有，廖汉生曾经是贺龙大姐贺民英的警卫员，廖汉生同贺龙一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贺龙垮台是不可能不牵扯到廖汉生的，而且，也需要廖汉生出来做这么一个“陪衬”。

廖汉生虽然出身红二方面军，但是，却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刘伯承在反教条主义中落马以后，廖汉生接手南京军事学员的负责人，其时，政治委员钟期光也犯了错误，所以，北京中央军委一改惯例，任廖汉生为军事学院党委第一书记，钟期光是上将，而廖是中将，廖本人尽管推辞过，可是，上面不同意。开国以后第一届国防部的副部长中共有七人，他们分别是：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肖克、李达、廖汉生。这里廖汉生虽然叨陪末座，可已经比较令人瞩目，二方面军里面原则上只有肖克一人，后来又加上了廖汉生。而且，廖一做就是三任，直到文革开始。

廖为人脾气暴躁、说话很“冲”，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和司令员杨勇的关系不好，二人在军区会议上吵架的事情居然飘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让郑维山把他们俩人找来，对他们说：“你们已经闹了一次了，不要闹了。”（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该书 258 页）

杨勇是一员虎将的同时也是一个正直的领导干部，比较喜欢爱憎分明。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事情出来以后，李井泉特意告诉后来上山的廖汉生等人不要乱讲，要多听听，少出来走动，可见当时的政治空气之紧张。杨勇、李志民、唐亮、苏振华是表态最晚的四位上将，他们不同意把彭德怀说得“比杜勒斯还坏”的说法，郑重其事的给大会写了报告，以后没有被印发，文革中这件往事被重新提出来成为杨勇的罪行之一，专案组成员用药物、绳索来威胁杨勇交待他和罗瑞卿、彭德怀、贺龙的所谓“黑关系”，杨勇说你们要我死，我就不能死。不过，杨勇在文革中所受到的折磨其实是非常小的，比起廖汉生也差了一段距离，

“解放”也很快。廖汉生虽说和杨勇有些矛盾，可是，在杨勇被斗之前还主动要求“陪绑”，一时传出去成为难兄难弟，他们二人也是绝无仅有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同时被打倒的一对。1967年1月8日，廖汉生被造反派组织诱捕，说是去看大字报。文革中的这些造反派一词是笼统的说法，其实他们当中的成份相当复杂，很多人很多组织都是背后有人指使甚至来头十分之大的，他们即使抓错了人、办错了事也不会受到过分的责难，聂荣臻还没有被点名时，造反派就贴出来聂荣臻的大字报，“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造反派中间有学生，也有一些机关干部，还有一些是中央文革指派的所谓的“钉子”，往往是联席碰头会刚刚有了意见，这边造反派就已经取得了发言权。廖汉生自己的“罪状”最早不是从中央专案组那里听到的，而竟是从造反派口中得知的。于此可见，造反派的力度之大。

廖汉生的四条罪状分别是，第一个和杨尚昆勾结，这是主要是因为廖和杨尚昆的亲属关系，所以，廖本人也“荣幸”的加入了杨尚昆专案组的审查队伍中，成为一个“罕见”的“双料修正主义分子”（指的是党内、军内双料）。第二条是插手第一军。这点实际上因为贺龙询问廖汉生关于第一军领导成员变动的情况时，廖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而已，扯上这一点主要是把他和贺龙、彭德怀挂上钩。第三条是廖汉生每年去新疆视察其实是为了贺龙兵变“踩点”。1962年，新疆发生逃亡事件，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罗瑞卿打报告给毛泽东希望每年要对新疆作出视察意见来，防患于未然，毛泽东做了批示，同意派廖汉生前去，所以，廖每年都去，专案组提出这一条以后，廖让他们去查一查再说，结果，一查以后，再也就不问了，因为他们找到了毛泽东亲笔的批示。最后一条是说廖汉生对总部不尊重。

四条罪状两条是涉及贺龙的，廖作为贺龙手下的大将被专案组排名在许光达之后，是张飞一流的人物。1967年1月19日，廖汉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挂牌批斗，还被做了“喷气式”，和他一起的批斗的特别是站成一排的还有许光达、王尚荣、饶正锡三人，其中总后

勤部副部长饶正锡的罪名居然是“彭黄漏网分子”，（饶正锡本人担任过晋绥联军、西北野战军中的部队领导职务，和彭德怀、贺龙都有过从）比较廖等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饶正锡低了一等，可是，他却比廖等人多关押了一年多。

对比许光达、王尚荣的审查待遇，廖汉生实在是“轻松”的多，最严重的是 1968 年 2 月，也就是毛泽东 1968 年 1 月点名贺龙以后，一天审问廖达四次之多，而且，不准休息睡觉，一旦说的不符合专案组胃口，就被呵斥、责骂和侮辱，然而始终没有殴打。这点比起许光达和王尚荣乃至黄新廷、顿星云等人的境遇来说已经是十分的“难得”的了。

实际上从后来贺龙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供述中知道，廖汉生专案并不是重点，原因是廖本人的很多行动基本上或者说完全上同贺龙联系不到一起去，就是北京军区号房子一事也不是廖去办的，也不是廖指示办的，廖本人所谓的对总部不尊重所发出的言论中的几位领导人都在文革中被批臭打倒，根本不成为罪证。所以，对廖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斗争”，而且，廖本人在专案审查期间态度不太好，也没有按照惯例“打他的态度”，竟然平稳过渡了事。

林彪死后，毛泽东让李德生去找廖汉生，转达了两条指示，第一条是廖汉生有错，但是没有罪；第二条是解除监护。毛泽东说：“

廖汉生和杨勇一样，都是没有什么罪，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暗中整下去的。”就这样，廖被安排到军科院做了政治委员，时间是 1973 年 12 月，此前和他前后被解放的还有黄新廷、秦基伟等人。

专案组在廖汉生身上没有得到的东西随后在成钧、雷英夫身上找到了。

18.逼供成钧

成钧，湖北石首人，1955 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时任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本人自从 1959 年 4 月兼任空军技术部部长以后，在空军指挥本部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

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来，同贺龙的关系很好，走的也比较近，因而被看作是所谓贺龙“集团”的干将，至于雷英夫则因为康生的特殊“关照”，被点名进入贺龙“二月兵变”的爪牙。

原本没有从许光达、廖汉生和王尚荣等人嘴里掏出的专案组想要的信息，这次就准备从成钧、雷英夫身上动手，希望打开缺口，而这副重担就落在了新近接手贺龙专案组第一副组长，原总参某部处长李国西的肩膀上。

李国西，原名李国熙，他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推荐来的人。王新亭和谢富治前后都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张国焘、陈昌浩眼中的红人与亲信，张国焘垮台以后，王新亭一度黯然，而后逐渐走出阴影，王新亭在太岳军区工作时就极力推行左的一套做法，文革起来之后，成为全军文革小组中排名靠前的副组长，特别是王新亭以副总长的身份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和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杨成武、肖华同列，可见他当时的地位了。关于推荐李国西一事，王新亭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也许这种事情委实太小，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李国西上来以后比朱铁铮也不差，朱铁铮临走时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贺龙专案组的同仁们说，看看罗瑞卿专案组和贺龙专案组谁先打开突破口。李国西就把贺案的突破口放在成钧身上。成钧在多次熬审以后，口气开始松动，成钧本人患有心脏病，李国西让专案组进行车轮战术，注意不要过于殴打，以免成钧意外死亡。

审成钧主要来自这么几点的认同，第一个是成钧和吴法宪、余立金的关系一直紧张，特别是和吴法宪的关系较差，吴法宪对林彪说过，他指挥不了成钧。第二个是康生的点名，康生说过，成钧是贺龙在空军的黑干将，他管技术，没有他，贺龙兵变不能成功，他是贺龙兵变以后的“空军司令员”。

成钧在最初的阶段曾经胡乱供认说贺龙为了发动兵变，前后一共召开了“八次黑会议”，

给各大军区的亲信都布置了任务等等。随后，成钧又翻供，一共翻了三次，让李国西知道以后告诉专案组的人要“打他的态度”，这样就给成钧用刑，用刑以后的成钧把口供锁定在贺龙兵变的时间是“十月一日”。

空军早在六十年代就很受林彪的重视，多次对空军的领导权表示关注，从以后林彪培养林立果并且把林立果送到空军去工作，用叶群对吴法宪的交待那就是“林副主席对空军的空前信任”来看，林彪对空军抓的很紧，而空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时，空军内部虽有矛盾，但是，并不突出，这也是因为刘亚楼为人相对公允，1959年，何廷一上庐山时，杨尚昆对何廷一说过这么一句话，杨说：“你们司令员刘亚楼的发言没有过头，比其他同志的发言要客观、公道。”在第一次庐山会议那种背景下，能够做到刘亚楼这样的结果已经实属不易。刘亚楼死后，吴法宪接任，包括刘震、何廷一等人，和吴法宪的关系不那么融洽，贺龙主持整顿海军和空军工作时，成钧、刘震都向贺龙汇报了吴法宪、余立金的事，贺龙曾经单独表态要对空军领导班子动手术，林彪不同意。康生在揭发二月兵变的有关会议上说何廷一准备利用驾驶飞机的机会暗害毛泽东，所以，江青以后就在大会上点名说：“吴法宪是个好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空军真正的坏人是刘震、成钧、何廷一！刘震、成钧、何廷一就是关锋同志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震我不认识，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大土匪、大军阀贺龙的死党。何廷一好像见过面，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杨尚昆的人。他们有一个吃喝小集团，整天吃吃喝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引自钟兆云《一个老兵眼中的杨尚昆》）

而打倒成钧、何廷一等以后，吴法宪确实获益匪浅，他在文革中对空军指挥权的把持已经到了空前的地步，以后，吴法宪对林立果越次提拔乃至把空军的指挥大全私自交给林立果，听任林立果、周宇驰等人专横跋扈，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出来以后有憾于林立果的事情曾经责问吴法宪说：“吴法宪同志，林立果不过是一个娃娃，你们为什么把他捧的那么高？甚至把

兵权也交给他？”（引自《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一版，该书 227 页，张瑞蔼回忆原话）通过对林立果的扶持，吴法宪在林彪集团中的地位也牢固不破，成为仅次于黄永胜的第二号大将。

19. 毆打雷英夫

雷英夫，曾经做过周恩来的军事秘书，有“洛阳才子”之称，1955 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文革”中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此人用刘少奇的话评价就是：“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1965 年年底在罗瑞卿事件中，雷英夫就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提供了诬告信，刘少奇当时就表示疑问，不相信雷英夫所提供的材料，并且说了上述那番评价雷英夫的话。1966 年，八月十三日，雷英夫给林彪写信揭发刘少奇，原信部分内容如下：

- 一、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从不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传达执行主席的指示。
- 二、自以为可以和毛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这里，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1、1964 年 12 月，罗瑞卿在人代会上讲“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事前，彭真亲自定了调子；2、1965 年 9 月，朱德在会议上提出，将来打起仗来，“最高统帅是刘少奇同志”，根本不提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朱德坐在一起，不加反驳，还很得意，看来很听得进去，使人吃惊；3、近年来，每逢十一、五一等节日，报上都是刊登毛主席、刘少奇两张一样大小的照片，从未见刘少奇有谦虚的表示；4、“***”文章中提出“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此事由来如何，不清楚。
- 三、刘少奇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外，在历史上也犯过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懂得毛泽东思想。

四、刘少奇在组织路线方面也有很多错误：1、不传达不执行主席指示；2、对主席不请示不汇报，搞独立王国；3、安插私人，有宗派圈子；4、包庇坏人。彭真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非常狂妄，例如在1965年彭德怀调离北京去西南前对彭德怀说，“如林彪身体不好，你还是国防部长”。

五、攻击养病的老同志。1963年5月底，刘少奇在昆明说，“不做工作比什么错误都大”。又说，这些人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了，现在他们已经有产了，有产不只是有钱，老资格、名誉、地位、功劳、文章写得好都可以成为资本。

雷英夫的这份材料真正有意义的不多，倒是不少属于他自己的推测，其中“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疑惑也说明当时有些事情属于雷英夫这个级别不能与闻的，根据后来吴冷西等人的回忆，这段话恰恰是毛泽东自己亲笔加上的话，在中央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犯罪集团”时，雷英夫曾经多次去总政治部两案办公室去索取他的五本笔记本，原来，这五个笔记本中详细记载了雷英夫为什么会写这份材料的由来和叶群代表林彪同雷英夫的谈话记录，根据林办秘书回忆，“1966年8月13日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来找叶群，叶群拿了一份材料让他誊抄。他抄了两页，另一个工作人员抄了七页。叶群让雷英夫在材料上签了字。”（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上卷）

雷英夫在两案负责人之一的史进前找他谈话以后，极力澄清此事自己是如何被逼无奈等，但是，白纸黑字和雷英夫参与诬陷刘少奇的罪恶活动是无法澄清的。

然而，这么一个对于打倒刘少奇的有功之臣何以就在十二天以后，也就是1966年的总参八二五事件中倒台了呢？这还要从雷英夫与江青、康生等人的矛盾说起。

1965年4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中联部执行一条卖国路线，指责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是机会主义等，雷英夫在会后对康生说，这个路线是周总理主持制定的，这么说是不是涉及到总理，是不是不合适？康生没有给予理会，事后，雷英夫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随后，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向毛泽东讲了康生的谈话，毛泽东要康生来，毛泽东问康生，谁让你讲的这番话？开始，康生不承认说过，接着，毛泽东说，雷英夫已经报告总理了，你的讲话为什么不经过常委的讨论，为什么不经过我的批准呢？康生就做了自我批评，还掉了眼泪，说对不起主席总理云云。

作为毛泽东的亲信的康生这次可以说是大丢面子，而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对康生如此责问呢？早在1963年，毛泽东自己就点名批过中联部的三和一少，何以这时候不同意康生的讲话呢？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经针对王明等人写过九篇言词激烈的“激愤之作”，这几篇文章没有在党内公开发表，只交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个人看过，胡乔木作为秘书有幸得以亲见。（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13页）而这九篇文章突然在1965年1月的时候，被毛泽东批示给李井泉、陶铸、谢富治三人传阅，并且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原文中有多处提及周恩来，指责周恩来的字样，这次，也就是1965年1月2日的这次提议修改之前被毛泽东划掉文中周恩来的名字，毛泽东说：“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的多。”（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册，49页、50页、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而1965年1月又是什么时候呢？毛泽东以后在七十年代见到斯诺时回忆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思考就是在1965年年初形成的，而毛泽东同胡志明回忆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思考的形成时间则定为1964年年底，不论是1964年年底还是1965年年初，这时候可以说毛泽东已经准备拿下刘少奇不再作为他的接班人了，所以，为了达到在拿下刘少奇以后，中央政府继续有人在把握全局上做到很好的配合，他不能不借重于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在党内威望很高，再有周恩来对于经济工作的内行领导不至于因为这样政治上的大动作让国家处在一种长期混乱之中。也因此，毛泽东不是不同意批判外交路线，而是不希望看到康生等人把矛头对准

周恩来。

但是，这里面的曲折发展是需要历史作出结论的，雷英夫怎么会完全知道内中的关联呢？他的这一冒头无形中成为康生的“对头”，当康生大权在握以后，自然不能放过雷英夫。至于说到江青与雷英夫的矛盾则在于雷英夫的女儿参与了围攻江青的活动，江青自然不能放过雷英夫，正好八二五事件发生以后，江青就对周恩来说，雷英夫是原来埋在你身边的定时炸弹。而后，毛泽东在雷英夫的材料上批示“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雷英夫专案审查是在总参专案中十分受到重视的，李国西派得力干将李玉清去提审雷英夫，第一场过堂就让雷英夫罚站 23 个小时，随后，专案组几个成员用皮鞋狠踢雷英夫，用李玉清后来的交待说，雷英夫“痛得满地打滚”，他们动用了刑具，雷英夫的小腿被打折，以后做了特殊处理，雷英夫的背部被打成重伤，就在这种情况下，雷英夫招供贺龙准备兵变的时间是十月一日，这就和成钧所说的十月一日吻合了，这两份材料被剪裁以后成为贺龙兵变的主要证据报送毛泽东处。

雷英夫被关押八年之久，以后还是叶剑英、周恩来发话请示毛泽东以后才被放了出来，周恩来在批示中说：“你们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雷英夫同志。政治上解除监护，由刘革非同志陪住。凡属刘革非能听的报告和文件，都要给雷英夫同志看，让他听。要组织专家和医生为雷英夫会诊，手术问题要等中央批准。”而雷英夫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大抵和他曾经揭发过刘少奇多少有关。